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117期(民國111年9月),83-122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重建合法性
——滿洲國的地方調查、模範村及其「教化」*

林志宏**

摘　要

滿洲國如何控制地方社會，並樹立統治基礎？本文從三方面檢視政權合法性確立的過程，闡明其中治理政策之轉向。首先，利用大同學院的「見學旅行」報告書，觀察調查工作如何深化殖民者對縣政的認識。這些資料除了代表考察地方時所積累的「知識生產」外，也呈現新政權面臨的統治難題。對殖民當局來說，調查活動猶如對地方行政的再確認，並運用統計方法增進治理效能。其次將焦點放在滿洲國重建農村的政策上。當官方實施各項產業開發與經濟統制活動之際，影響範圍更擴及農村，1934年大同學院的地方調查即為此一體現。通過重建農村、建立理想社會的宣傳，殖民者同時向民眾訴求「現代性」的統治理念。為了釐清滿洲國怎樣達成合法性統治，本文最後則以模範村風潮和推動「教化講演」為例，觀察日本的殖民策略。1934年起，奉天省分別於瀋陽、蓋平、海龍、梨樹等地開啓「實驗村計畫」，一方面符合不同產業的需求，另一方面移入日本居民，以期強化統治。此外，以「報國」為名的宗教結社，配合戰爭需求向社會民眾徵求動員。這些運用普世價值以美化侵略之舉，形成滿洲國與殖民當局所謂「道德門面」，也成為日本帝國主義發展的特徵。

關鍵詞： 滿洲國、日本帝國主義、社會調查、模範村、教化

* 本文係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帝國日本與『滿洲』殖民：調查．人流．地方認識——非正式帝國的地方基礎：滿洲國大同學院之活動及其變遷」（MOST 107-2410-H-001-016-MY2）之成果。初稿宣讀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知識史研究群、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主辦的「帝國知識與資源調查」工作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會議室，2019年9月6日），感謝與談人汪正晟教授及與會學者的意見。其後復經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之修改建議，使本文更臻完善，謹致謝忱。惟文責仍應由筆者自負。
收稿日期：2021年9月13日，通過刊登日期：2022年5月27日。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一、前　言

1932 年 3 月 1 日滿洲國成立後，日本陸續展開各項措施，企圖掌握中國東北地方社會。除了軍事掃蕩、弭平各地武裝勢力外，最令人注目的是提出「地方自治」口號，[1]進而製造分裂國土的矛盾，達成殖民統治和擴張之實。以往釐清日、滿兩國的從屬關係時，論者常以二元對立──「侵略」或「開發」──面向分析，致使詮釋日本支配滿洲課題，不免陷入道德價值判斷之困境。若以「侵略」視角而言，滿洲國自不啻爲走狗，是敵人扶植的傀儡政權，充滿負面評價；而「開發」論則是刻意美化日本的擴張之舉，歌頌其「殖民現代性」（colonial modernity）。

因此，滿洲新國度究該採取何種認識，相信言人人殊，恐難具體言明。倘從建立烏托邦的角度來看，當時不管置身局內或局外，均有不少人表示支持態度，甚至稱其爲「惟一浪漫的侵略行動」。[2]山室信一指出這種賦予正當性的結果，使得滿洲國的定位充滿爭議；爲了解資本主義問題，同時避免共產勢力擴張，其政治規劃的形象猶如是隻身兼獅頭、羊身、蛇尾般的巨獸，兼又充斥「國家型態的殖民地」之意涵。[3]相較於此，楊露誼（Louise Young）和伊瑪．奧德懷（Emer O'Dwyer）直截以日本帝國的殖民地看待其中關係。她們以市民社會參與動員形式來理解日本對滿洲之殖民開發，討論包括軍事擴張、經濟

1　〈滿洲國地方自治制改善案〉，《滿洲評論》，卷 4 號 15（1933 年 3 月），頁 23。該文主要傳達滿洲國國務院民政部的想法，「自治」其實是日本扶植傀儡政權分離中國的政治修辭。簡言之，日本殖民當局以「指導」爲名，協助地方實力派推動「獨立」，先以「地方維持」爲口號，進而提出「地方自治」。滿洲國初建之際，民政部進一步指稱：以往中國實行地方自治有其缺陷，結果造成土豪劣紳持續壟斷基層社會，以致縣市的地方團體無從眞正達成法治目標。這裡所謂「土豪劣紳」係指奉系勢力的張作霖、張學良一家。嗣後，殖民當局爲了有效地控制滿洲國，更公布《縣官制》加強中央集權化。關於此一曲折過程，另請參考林志宏，〈地方分權與「自治」──滿洲國的建立及日本支配〉，收入黃自進、潘光哲主編（下略），《近代中日關係史新論》（新北：稻鄉出版社，2017），頁 643-683。

2　此語出自賀川豐彥（1888-1960），見武藤富男，《私と満州国》（東京：文藝春秋，1988），頁 12。

3　山室信一，《キメラ──満洲国の肖像》（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06，增補版三版），頁 8。

統制、開拓移民，乃至在地意識的形成等，描繪了箇中發展情形。[4]可是無論採取哪種有關支配的分析，以往學界檢視日本對滿洲的治理課題時，亟少關注到實際「參與者」及其定位。尤其針對基層社會的態度上，時常忽略當中細節，難以得悉「底層帝國主義者」（subaltern imperialists）之行爲。[5]所以，我們也無法掌握日本殖民工作的「地方基礎」（local foundation）到底何在。

本文旨在究析滿洲國對地方基層塑造合法統治之過程。筆者將從三方面談及滿洲國官方如何訴諸「統治理性」（governmentality），使自己成爲日本「非正式帝國」（informal empire）之一環。第一，通過社會調查，殖民者建立「知識生產」和「地方認識」的基礎，利用各項數字統計、文字紀錄及其描述，強化治理效能。有別於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簡稱「滿鐵」），[6]筆者認爲釐清這些地方基層對殖民政權的態度如何，不妨可由「大同學院」的報告書來觀察。創建於 1932 年 7 月 1 日的大同學院，原是滿洲國爲了培育行政治理人才而設。[7]該院和滿洲國歷史相始終，先後共籌辦 19 期的招生活

4 Louise Young, *Japan's Total Empire: Manchuria and the Culture of Wartime Imperial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Emer O'Dwyer, *Significant Soil: Settler Colonialism and Japan's Urban Empire in Manchuri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5 「底層」（subaltern）一詞係指來自地方的階層和群體，最初是由後殖民理論學者所提出的。它起源於以歐洲爲中心的歷史研究方法，並用在討論非西方民族（非洲、亞洲和中東）與西歐帝國歷史間的關係。近十幾年來，帝國研究特別留意底層群體在殖民者的行政管理之下，怎樣通過行動發展出合乎自我意識、利益與具現代性的形式，並以此對抗或消解帝國主義的權力宰制。而這股風氣也帶動人們理解到有不同群眾參與日本帝國主義擴張，涉及共同協力動員或反對戰事。見 Gyan Prakash, "Subaltern Studies as Postcolonial Criticism,"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9:5 (December 1994), pp. 1475-1490; Jordan Sand, "Subaltern Imperialists: The New Historiography of the Japanese Empire," *Past and Present*, vol. 225 (November 2014), pp. 273-288.

6 毫無疑問，日本對中國所推動的各項調查中，滿鐵係最受矚目之機構，其成績也爲人津津樂道。不過，此一號稱對華最大之「國策調查機關」，對近代中國地方社會形態的描述，並非毫無侷限。黃宗智和杜贊奇（Prasenjit Duara）就此一再提醒讀者：滿鐵調查工作實有其著重面向，應提防當中任何片面說詞，且須泛覽及精讀資料才行。Philip C. C. Huang, *The Peasant Economy and Social Change in North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42-43; Prasenjit Duara, *Culture, Power, and the State: Rural North China, 1900-1942*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6-7.

7 國務院總務廳編，《滿洲國政府公報》，號 23（1932 年 7 月 11 日），頁 1。大同學院最初出現原是爲了推動分離中國，由殖民當局關東軍所設置的「自治指導部」（1931 年 11 月 9 日成立，以于冲漢爲自治指導部部長，1932 年 4 月 30 日解散，後改稱「資政局」），直屬國務院總理管轄，衍伸成爲滿洲國訓練中央幕僚與地方官吏的教育機關。其中過程見王貴忠，〈關東

動，[8]訓練近 4,000 名院生。嗣後他們有人出任縣級參事官，協助殖民統治，係本文認定的「底層帝國主義者」，也是傀儡政權滿洲國發展下的一項特色。[9]

第二項焦點，是針對滿洲國地方施政的階段性變化，解明其統治理念及轉向。隨著日後推行產業開發與經濟統制，殖民當局將影響力擴展至廣大農村的民眾身上。這項政策的推展，本爲因應當時全球工業化、資本主義和城鄉問題導致的「農村破產」現象而來；它不獨爲滿洲自身情況，也是近代中、日兩國共同亟待解決的社會問題。簡單地說，滿洲國和殖民當局以重建農村、樹立理想社會爲號召，強調「救濟」、「振興」農民生活，完成「以農立國」的目標。嗣後配合戰爭動員之需，農村的地方行政改頭換面，強化殖民者之權力。

第三，爲了充分瞭解其中過程，筆者試舉兩種實踐形式——建設模範村與「教化講演」爲例，觀察殖民者怎樣運用行政措施以達其統治正當基礎。這兩種治理實踐並非憑空而來，各有其時空脈絡可循。面對滿洲國境內民眾，它們猶如是一政治說服的過程，在鞏固滿洲政權問題上，更是重建合法性之工具，並可對國際社會宣傳。

此處對本文史料可能存在的侷限稍加說明。首先，筆者利用的大同學院各類報告書、奉天省公署教育廳編纂小冊及報刊文字，無疑皆站在官方的角度立論，以符合殖民者的心態而思考。其次，亟難由報告書中課題的選擇及擬定尋其決策主導者，僅能從每次些微變化之間整理出差異性。復次，這些出版品的「生產」過程絕非毫無疑義：無論是從旁考察的時間有限，抑或蒐羅資訊經常屬於片段（詳後），可以想見調查活動有許多不確定因素，自然無法像人類學

軍自治指導部始末〉，《日本研究》，1993 年第 2 期，頁 63-66；林志宏，〈地方分權與「自治」——滿洲國的建立及日本支配〉，收入《近代中日關係史新論》，頁 663-665。

8 這只是粗略劃分。根據大同學院招生辦法，可分爲第 1 部（共 19 期）、第 2 部（共 9 期，再分爲新、舊部），以及研究所（共 2 期）。第 1 部係自日本帝國圈內（含殖民地臺灣、朝鮮）的大學或專科畢業生中遴選出來，而第 2 部則於 1934 年 11 月起成立，從滿洲國內高校畢業生或現職年輕官吏之中擇優錄取。貴志俊彥、松重充浩、松村史紀編，《二〇世紀滿洲歴史事典》（東京：吉川弘文館，2012），頁 336-337。

9 誠如楊家余指出，滿洲國的統治特徵爲「次長中心制」（亦即實際權力皆由擔任副職的日本人所掌握），惟並無詳論。楊家余，《內外控制的交合——日僞統制下的東北教育研究（1931-1945）》（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5），頁 16-27。

家紀爾茲（Clifford Geertz）那樣採取「深描」（thick description）爲書寫策略。[10]不過儘管如此，直觀和訪談所記載留存的文字，有時卻毫無掩飾地呈現基層（縣或村級行政單位）的態度，在這些被官方包裝的著作裡展現出來，依然有其價值。[11]惟有透過推敲分析，方能獲致弦外之音。

二、啟動「地方認識」

探討滿洲國的社會調查模式，有必要敘陳負責該項工作的機構——大同學院之性質。誠如前述，它係滿洲國培育行政官僚之場所。然受民族情感影響所致，1930 年代中文報刊經常視其爲「文化侵略」或「漢奸養成所」的代名詞，[12]故論及院生畢業後活動時，往往語焉未詳，遑論地方治理之況。[13]實際上，此一儲備官吏的機構，課程訓練上還兼有「認識地方」的活動，以利日後

---

10 現代人類學家對民族誌寫作，往往是基於一種尋求意義的詮釋，因此會把人們無意識的行動看做是「符號」來理解。爲了能有效掌握行動背後的文化意義，通過描述後而提升到抽象的分析，此方法即所謂「深描」。在這樣反覆琢磨而出現的文本，其實也不免帶入主觀想像或過度闡釋的問題，形成大家共同閱讀的內容。這方面的反思，請見 Clifford Geertz,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pp. 3-30.

11 筆者以第 1 期第 4 班到開原縣調查爲例。縣長丁一青對日軍部隊人員薪給由縣內供應始終頗感困擾；當日系指導員言及北滿窮迫形勢而望縣內共同爲王道努力時，丁氏則反譏其中行政的不合理處，認爲兵隊並無替縣內財政著想。有趣的是，這段對話卻被院生毫無保留地記錄下來。大同學院圖書部編，《奉天省各縣視察報告》（大連：大同學院，1932），頁 201。

12 如〈日人沒收東北各大公司．設大同學院作文化侵略前驅〉，《益世報》，1932 年 7 月 26 日，第 2 版。至於「漢奸養成所」的說法更多，可見金平歐，《對日決鬥之認識與策動》（南京：拔提書店，1933），第 5 章，頁 151；維貞，《九一八後東北與日本》（上海：貞社，1935），頁 174；孫陵，《從東北來》（桂林：前線出版社，1940），頁 8-9。嚴格說來，中文報刊書籍裡並未明瞭大同學院成員的來源，包括有日本「內地」、殖民地臺灣和朝鮮，以及滿洲國內「滿系」（漢、滿、蒙古）等族群。因此「漢奸」說法，泰半是流於民族主義的情緒性字眼而已。

13 有關滿洲國的地方基層治理，國、共兩黨均有類似描寫：「自民二十五年起僞政府……以本地人爲正，則必委一日人副之，遇事惟以日人之鼻息是仰。在康德元年間曾有多處縣參事官（日人）爲縣長槍殺，可以說全是由於積忿所致，從可窺得此中消息之一斑了。」另外，又云：「副縣長是一種新的創造，必須由日人擔任。……副縣長皆爲日人，即從前『首席參事官』的變名。此外有日人參事官多人。各局置『首席指導官』一人，『指導官』數人，以資操縱全縣政務。」見周鯨文主編，《淪陷八年的東北》（香港：時代批評社，1939），頁 14；延安時事問題研究會編，《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淪陷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頁 175-176。後者原書係 1939 年由解放社出版。

行政工作之準備。從創設伊始，大同學院即安排院生「見學旅行」的課程。[14] 雖然早自 1880 年代日本便有教學結合旅行的風氣，[15]惟不同者，大同學院以培訓統治人才為目標，故見學調查肩負強烈的政治任務。

身為統治「代言人」立場，大同學院課程進行的縣政調查，從而積累出龐大的資料。調查報告書提供的任何隻字片語，除了有利於穩定執政外，還強調科學式管理的重要。雖然如此，我們也不能完全把參與院生看作是毫無自我、缺乏獨立意志的群體。儘管他們深受殖民教育影響，惟對現地實際施政上，是否真正符合當局期待，甚且貫徹其政策？[16]馬克．哈里森（Mark Harrison）研究大英帝國的殖民醫學時，發現英人在印度推展衛生工作，往往因各種不確定條件所影響，以致產生各項抵制行為。[17]從這個角度來看，任何統治都無法忽略其中「地方思維」的層面，偶因特定時空或人為操作，不必然盡如官方意願。

（一）大同學院初期的「視察報告」

大同學院的旅行調查中，以第 1 部的第 1 期、第 2 期之「視察報告」最具代表性。原因在於：這些報告書均有日誌載其過程，且透露滿洲新政權所面對的各項問題。雖然其中詳略不一，卻相當程度地反映出調查性質，乃至殖民者

14　本文主要著重在第 1 部院生為期兩週的見學旅行討論上。至於第 2 部院生主要是有關日本的視察，這方面筆者已另有撰文探究，茲不贅論。

15　近代日本最早的修學旅行紀錄係 1887 年。它跳脫傳統書塾的教育模式，利用移地增進學習，一方面讓學生對知識有更深刻的體認，另一方面藉由團體生活強化人際關係。這類旅行見聞更撰成書面報告，後來普遍運用在帝國日本對亞洲的想像與描述上。東亞同文書院的調查旅行即是眾所習知之例。新谷恭明，〈日本最初の修学旅行の記録について：平沢金之助「六州遊記」の紹介〉，《九州大学大学院教育学研究紀要》，号 4（2002 年 3 月），頁 37-61；藤田佳久，〈東亜同文書院生の大調査旅行と『支那省別全誌』および『新修支那省別全誌』との間──書院生が見た近代東アジア〉，《愛知大学東亜同文書院大学記念センター報》，卷 26（2018 年 3 月），頁 3-28。

16　如浜口裕子，《日本統治と東アジア社会──植民地期朝鮮と満洲の比較研究》（東京：勁草書房，1996），頁 131-135。作者沒有注意教育訓練及現地施政的複雜過程，僅略提及殖民當局如何控制地方基層，改編「保甲制」而推動「街村制」。

17　大抵說來，僅歷經西方教育洗禮的印度人較為熱衷。當地許多民眾為了維護自身的財富與利益，或受傳統影響，故對改革衛生一事加以反對。Mark Harrison, *Public Health in British India: Anglo-Indian Preventive Medicine 1859-191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166-201.

對地方基層的態度。此外調查期間，院生遭逢各地諸多疑難，無形中也化爲他們日後的治理經驗，成爲實施地方行政之基礎。

前兩期院生後來出版了《奉天省各縣視察報告》和《滿洲國各縣視察報告》，均係大部頭著作。這些報告內容頗豐，惟不免囿於各項條件限制。如《奉天省各縣視察報告》的〈刊行辭〉言：受到掌握語言困難及不解民情影響所致，想在有限時間內完成精確描述，難免會有疏漏。[18]另一方面，視察報告也顯見殖民當局有意施行社會控制。鑑於各地抗日勢力多未敉平，第 1 期院生擇往比較安定的「南滿」──其奉天省境內──考察。可是第 2 期稍有不同，規劃至熱河、奉天、吉林、黑龍江、興安等省分；其中熱河、黑龍江都是發動戰事或武裝反抗較爲劇烈的區域，凸顯官方亟欲掌握現地情況。

第 1 期的奉天省各縣調查共分 8 班（每班成員 5 至 6 名），時間從 1932 年 7 月 7 日至 7 月 22 日；第 2 期則有 9 班（每班成員 11 至 12 名），時間從 1933 年 7 月 6 日至 7 月 20 日。兩期院生都自國都新京（今長春）出發，按照規劃路線、沿鐵路所及之區域展開。第 1 期既以奉天省爲範圍，故課程刻意安排了奉天市（今瀋陽）內的集體見學活動。據第 4 班所記，行程有奉天滿鐵圖書館、盛清故宮、奉天博物館（原張作霖、張學良府邸）、北大營、北陵等處，用意爲深化對史地的認識。之所以選在奉天滿鐵圖書館訪查，係因館長衛藤利夫（1883-1953）身兼大同學院講師緣故。[19]此外又邀請大東文化學院教授內堀維文（1872-1933）演講，題爲「關於中國國民性及其所長」；舉證「大陸文化」所培養的中國人性格，包括平時言論、外交手段、買賣行爲、國家觀念、交友舉止等十五條。[20]

18 大同學院圖書部編，《奉天省各縣視察報告》，〈刊行の辭〉，頁 2。

19 衛藤利夫係熊本縣人，1919 年進入滿鐵服務。中西利八編，《第三版滿洲紳士錄》（東京：滿蒙資料協會，1940），頁 1232。有關滿洲國初期衛藤的活動，另參林志宏，〈殖民知識的生產與再建構──「滿洲國」時期的古物調查工作〉，《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87（2015 年 3 月），頁 19；林志宏，〈地方分權與「自治」──滿洲國的建立及日本支配〉，收入《近代中日關係史新論》，頁 664。

20 大同學院圖書部編，《奉天省各縣視察報告》，頁 196。內堀的演講內容應出自先前的文章，見內堀維文，〈中國民族の長〉，《日華學報》，號 11（1930 年 1 月），頁 44-66。內堀維文

此後見學旅行成爲各期大同學院生的例行課程，考察農村財政、日常生活、自治成效，乃至農民的知識程度、對國家與民族的忠誠，以及民眾對成立滿洲國的理解等。兩種「視察報告」羅列的調查項目也五花八門，包括有行政區劃、土地面積、教育和宗教分布、金融和商業組織、農業和衛生情況。這些涉及行政、地政與財政的調查，反映殖民者企望從多方來瞭解縣政運作；第 1 期報告書強調滿洲是「以農立國」，故以視察農民生活作爲立法參考。[21]

（二）見學旅行與調查工作的性質

不容諱言，大同學院各班前往調查的縣分，偶因治安惡化被迫臨時更改行程。[22]院生凡抵一地後，省公署則派員前來座談，[23]接著由各縣副參事官或滿鐵地方事務所職員接待。除了運用既有的人脈關係外，院生與各縣縣長的會商也是重點所在。縣長主要介紹地方概況，並協助訪問農商會或有力人士。報告書內亦屢有關於現任縣長行止的描寫，如第 2 期第 3 班訪查北鎮縣時，院生率先留意縣長年齡，又觀其蠟狀皮膚，推知吸食鴉片。[24]兩種報告書共同觀察到西豐縣縣長馮廣民（1882-1954），稱其政治手腕高明，頗獲好評，每日天色未明便外出巡視；又說日軍入城、民眾頗感不安之際，惟獨聽命縣長一人。[25]

各地縣長也是向殖民當局傳達「地方思維」的前線。他們除了趁院生見學之際展示「治理成效」外，還藉此場合提出諸多要求。像遼陽縣長王德春

係熊本縣人，爲明治至昭和前期的教育家。晚清時曾任日本教習，後爲山東師範學堂總教習、南滿洲中學堂長、奉天中學校長、旅順工科大學教授、旅順第二中學校長、大東文化學院教授等。見〈故內堀維文先生年譜〉，收入法本義弘編，《內堀維文遺稿並傳》（東京：內堀維文遺稿並傳刊行會，1935），頁 1-14；上沼八郎，〈内堀維文と山東省師範学堂〉，《国立教育研究所紀要》，卷 115（1988 年 3 月），頁 65-73。

21 大同學院圖書部編，《奉天省各縣視察報告》，〈刊行の辭〉，頁 3-4。

22 如第 1 期第 5 班打算前往湯崗子宿舍駐紮，但該地在一個月前遭馬賊突擊，頻傳有危險之虞的情報，故決定取消。大同學院圖書部編，《奉天省各縣視察報告》，頁 281。

23 這類例證頗多，如〈大同學院生到佳木斯見學〉，《大同報》，1937 年 9 月 26 日，第 6 版；〈大同學院旅行班．到龍江省見習〉，《大同報》，1938 年 3 月 13 日，第 2 版。

24 大同學院圖書部委員編，《滿洲國各縣視察報告》（東京：大同學院，1933），頁 316。

25 大同學院圖書部編，《奉天省各縣視察報告》，頁 209；大同學院圖書部委員編，《滿洲國各縣視察報告》，頁 48。馮廣民爲奉天省鐵嶺縣人，曾任奉天教育會會長、東北大學總務長。滿洲國成立後，先後擔任西豐縣、錦縣縣長、錦州省民政廳廳長及北安省長。中西利八編，《第三版滿洲紳士錄》，頁 1292。

（1885-?）即稱：之所以未實施縣官新制，係因財源困窘，無以招募保警，甚至埋怨其薪資實與苦力相差無幾。[26]有些院生發現中央與地方對縣政的理念確有扞格。如通遼縣緊臨內蒙古，當地多爲蒙古族，治理上亟需因地制宜。縣長董雲卿（1892-?）的施政首要即強調族群和諧，次爲普及教育，最後才主張維持治安，但如此看法似與中央嚴加取締蒙古軍並不同調。[27]經由董縣長對蒙俗的說明，第 2 期第 3 班院生才徹悟到蒙、漢關係的緊張，雙方芥蒂頗深。報告書多描繪蒙俗特色，包括信奉喇嘛教與衛生習慣等，舉凡不利於殖民治理，都詳加記載下來。[28]

前述兩種「視察報告」皆成於滿洲國肇建期間。因此，院生觀察「自治」工作成效之際，相當留心既存的武裝力量是否危及官方。其中著墨最多在自衛團及保甲組織，建議徵稅確保縣吏財源，避免百姓鋌而走險，造成「匪賊」蜂起；又開原縣有「連莊會」，被院生大幅地描述，更收錄該會簡章及辦事細則。[29]類似內容不一而足，足見大同學院重視基層組織的功能；這也使得他們在對實際縣政與殖民者的想像相違之際，經常建議調整。[30]未幾滿洲國局部恢復保甲制度，[31]也多淵源於此。

---

26 大同學院圖書部委員編，《滿洲國各縣視察報告》，頁 121-122。王德春是奉天省新民縣人，北京大學畢業，曾任綏遠都統府秘書、歸綏銀行總辦；「九．一八」事變後充任遼陽縣稅捐局長。外務省情報部編，《現代中華民國滿洲帝國人名鑑》（東京：財團法人東亞同文會，1937），頁 624。

27 大同學院圖書部委員編，《滿洲國各縣視察報告》，頁 322。董雲卿是奉天省梨樹縣人，奉天法官養成所畢業，曾任通遼縣稅捐局長、通遼縣長，後擔任黑河省長官房參事官。外務省情報部編，《現代中華民國滿洲帝國人名鑑》，頁 673；中西利八編，《第三版滿洲紳士錄》，頁 964。

28 俱見大同學院圖書部委員編，《滿洲國各縣視察報告》，頁 330-332；363-364。譬如對蒙古民俗理解上，董縣長曾提到「冷水飲」的趣談：某男到蒙古家中借宿，翌晨男主人將會提供飲用冰水；一旦喝下，則蒙古習俗認定某男與女主人有染，須以生死決定。此外，蒙古族內兄弟半數充任喇嘛，以致共妻情形，使得患染梅毒機會增加，高達七成感染。

29 大同學院圖書部編，《奉天省各縣視察報告》，頁 230-234。

30 像是第 1 期第 5 班對遼陽縣內既有清鄉局的組織，指稱國務院訓令第四號的廢止命令，實際上各縣並未遵從，而是改以活用。他們建議應在法院內設置「清鄉處」，讓法律制度可以因應地方情勢而調整。大同學院圖書部編，《奉天省各縣視察報告》，頁 292。

31 〈中央治安維持委員會恢復保甲制度．目下令民政部起草中．齊齊哈爾保甲結團式〉，《大同報》，1933 年 9 月 5 日，第 7 版。

大同學院的見學旅行爲殖民者認識地方之始。日後擔任縣參事官的院生們，許多施政舉措得自其中體驗，這可從兩位第 1 期院生的經歷獲悉梗概。第一位是阿城縣的副參事官田中鈞一（1908-?）。爲了掌握有力人士的動向，維繫地方關係，他率先跟保甲長接觸，強化心理建設。在打著「爲新國度建造嶄新的縣城」口號之下，田中聲稱自己絕非侵略者；且值草木凍寒之際，他親訪保長張百深，雙方更就縣內治安、開發農村、普及教育等交換意見。[32]1933 年 4 月，當縣長呂佐周因「通匪」嫌疑被哈爾濱特務機關逮捕時，田中鈞一更出面斡旋，向有關單位抗議，尋求日人居間協調，最終獲釋。[33]無獨有偶地，同爲第 1 期院生的山口清勝（1906-?）擔任大賚縣副縣長，也和縣長郭文田（蒙古人，1880-?）關係情若父子。他們常因治安工作與日軍周旋；有時山口甚至站在縣長立場，抗拒日本憲兵隊的無理要求，合作無間。[34]

三、「以農立國」為名的調查

邁入帝政年號「康德」時代，滿洲國的地方調查朝向嶄新模式，以興辦農業、建設農村爲主。先是爲了廣拓資源，1932 年 7 月滿洲國在滿鐵協助下成立「經濟調查委員會」（簡稱「經調會」），制訂相關草案。經調會設置分管各產業的特殊會社（即「一業一社」制度），前往各地調查，1934 年 3 月通過〈日滿經濟統制方案要綱〉，成爲建設方針。[35]在規劃統制經濟之餘，開發

32 田中鈞一，《実録．型破り明治男》（東京：泰流社，1980），頁 46-50。田中係福岡縣人，專大法科畢業，見中西利八編，《第三版滿洲紳士錄》，頁 39。
33 田中鈞一，《実録．型破り明治男》，頁 66-73。
34 大同学院史編纂委員会編，《大いなる哉．滿洲》（東京：大同学院同窓会，1966），頁 246-249。山口係栃木縣人，早稻田大學法科畢業，曾任滿洲國民政部屬官；郭文田係卓索圖盟喀拉沁右旗人，曾任黑龍江都督蒙事專員、熱河蒙地總局總辦、蒙藏委員會委員等職。俱見外務省情報部編，《現代中華民國滿洲帝國人名鑑》，頁 629；中西利八編，《第三版滿洲紳士錄》，頁 713、1174。
35 貴志俊彥、松村史紀、松重充浩編，《二〇世紀滿洲歷史事典》，頁 462。

農村為首要任務，故啓動調查工作；時人稱此為「實現『日滿經濟結合』、『日滿統制經濟』之部分的措施」。[36]

考察農業實與近代「農村破產」的現象有關。受到工業革命及資本主義的快速發展，現代化促使人口大量移居城市，世界各地的城鄉差距日趨嚴重。在中國農村，貧富問題早為有識之士省察；[37]隨著南京國民政府的「北伐」統一，改良農業與鄉村建設教育逐步推廣，範圍包括了中國東北（滿洲）地區。[38]無獨有偶地，大蕭條風潮也令日本飽嚐農村社會破產的危機。滿洲新政權初建之際，大同學院前身——自治指導部的創立者笠木良明（1894-1955）即有類似的言論和主張。[39]他們痛感日本農村破敗，民眾生活無以為繼，致使社會上的共產勢力日增，因此構思滿洲國應在總體經濟的引導下，[40]開啓各項工作。以農業為例，1935 年國務院組便有鄉村社會調查團，後來又編纂報告書。[41]另外，實業部則制訂「農會法」，試圖成立「包含一般民眾之強力機關」，打破地主

36 者訓，〈日本對於東北農業的統制與農村的破產〉，《新亞細亞》，卷 11 期 5（1936 年 5 月），頁 72-78。

37 早先開啓實際工作之先河，係河北省定縣翟城村的米鑑三、米迪剛。這方面簡略的經過可見喬啓明，《中國農村社會經濟學》（上海：上海書店，1992，影印商務印書館 1947 年版），頁 440-443。

38 例如有人建議推動合作社事業。實實，〈合作運動與鄉村改良運動〉，《吉林民眾教育講演月刊》，期 3（1930 年 10 月 31 日），頁 4-7；李紫翔，〈中國農村運動之理論與實際〉，《新中華》，卷 3 期 18（1935 年 9 月），頁 5-14。

39 Sandra Wilson, *The Manchurian Crisis and Japanese Society, 1931-33*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 64; 林志宏，〈地方分權與「自治」——滿洲國的建立及日本支配〉，收入《近代中日關係史新論》，頁 650-653。有關日本農村振興問題，可見克里．史密斯（Kerry Smith）著，劉靜譯，《危機年代：日本、大蕭條與農村振興》（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8），特別是第三章。笠木是栃木縣人，東京帝國大學法科畢業，1919 年與大川周明、北一輝等人創立右翼組織「猶存社」，是推動滿洲「獨立自治」的核心人物。中村義等編，《近代日中関係史人名辞典》（東京：東京堂出版，2010），頁 173。

40 論者指稱：與日本一樣，以強調凱恩斯理論（Keynesian theory）為主的滿洲國行政部門，即在 1934-1935 年間透過總體經濟規劃來復甦各行業，尤其建築業獲致快速增長。Tim Wright, "The Manchurian Economy and the 1930s World Depression," *Modern Asian Studies*, 41:5 (September 2007), pp. 1100-1105.

41 〈鄉村社會調查報告書編纂〉，《滿洲評論》，卷 8 號 16（1935 年 3 月），頁 20。

壟斷，並計劃「分配優良種子，派遣農村技術員，指導農村耕稼等事業」，期能眞正實現「農民更生」。[42]

（一）鄉村社會調查的展開

考察滿洲國如何開啓農村調查，大同學院仍係極佳切入點。前述兩期院生的「視察報告」，雖提出增加農作收益之構想，[43]惟第 3 期見學課程裡，有更多類似鞏固農業政策的安排。

1934 年 7 月，大同學院第 1 部第 3 期依例舉辦爲期兩週的「夏季調查」，分成 18 班往熱河、奉天、吉林、黑龍江、興安等省。隔年，調查結果正式出版成《滿洲國鄉村社會實態調查抄》一書，有 1,616 頁巨幅。這次見學宣稱踏遍全滿境內「鄉村」，實際上熱河、吉林、興安省均係點綴而已。此外，缺少了旅行日誌等內容，難以完整獲悉院生路線，僅能假定係屬一次定點式的活動。

値得一提者，爲調查活動對院生形成許多制約。除了時間、經費外，就連怎麼選定調查村落，都得配合官方抽樣進行，如此勢將影響報告的準確性。像第 4 班調查營口縣石橋子村，即以天數、費用等因素，僅以縣府選定的 30 戶爲主；第 12 班則是採納當地參事官建議，選定地點，又有人員派遣從旁協助。[44]至於第 10 班負責梨樹縣富有莊，也自承調查有其缺陷，像是時間倉促、短暫，又乏訪查經驗，且受訪農民無法正確理解提問，加上旁譯者毫無任何知識背景，還有對於殖民當局的誤解等，以致大打折扣，不易道出實情。[45]

儘管有上述弊端，第 3 期仍延續舊有的調查模式，包括殖民者最關切的統治效能及控制力，尤其基層農民普遍的感受爲何？凡此皆有設問。嚴格說來，

42 〈農村復興聲之中根本救濟農村方案．實業部籌計農會法．確立強力農會及模範村．涵養自治精神發展經濟〉，《大同報》，1935 年 8 月 22 日，第 11 版；〈爲期農民更生．決助成模範村成立〉，《大同報》，1935 年 10 月 6 日，第 11 版。

43 譬如遼陽縣調查時，曾舉滿鐵地方事務所長關屋悌藏提出獎勵棉作辦法，還配合奉天紡紗廠的加工與市場銷售，試圖成爲殖民當局所保護的產業。大同學院圖書部編，《奉天省各縣視察報告》，頁 313-333。

44 滿洲國大同學院圖書部委員編，《滿洲國鄉村社會實態調查抄》（東京：滿洲國大同學院，1935），頁 257、929。

45 滿洲國大同學院圖書部委員編，《滿洲國鄉村社會實態調查抄》，頁 891。

前兩期「視察」活動仍處於摸索階段，而此時的見學目標更形明確。[46]另一延續工作爲評估保甲成效，尤其傳統農村武裝組織──自衛團對治安的影響。舉例來說，第 5 班在鳳城縣赫家溝村調查時，強調當地係知名的「匪賊產地」，亟需藉由保甲控制。報告中提及民間槍枝回收情形外，還確認村長本人絕非匪賊成員；又抄錄治安維持會捕殺鄧鐵梅（1892-1934）等人後的宣撫公告。[47]比較特別的是在面對多元族群的殖民治理上提供肆應辦法。第 18 班前往興安省海拉爾大鋸廠街調查，該地係一朝鮮、滿（漢）、俄羅斯等各族雜居地；院生認爲自蘇炳文（1892-1975）勢力剷除後，住民大致安居樂業，暫無組織自衛團之必要。[48]

基於統治理性精神，第 3 期調查屢稱舊社會體制乏善，是造成農村疲弊、窮困的要因。尤其每處設有「村費」，帶給民眾莫大負擔。第 12 班調查洮南縣振興村時，稱此類加徵捐稅經常轉嫁至農民身上，令其不堪其擾。[49]至於攸關農村土地稅的問題，是「蒙地」所有權之交涉與讓渡。第 13 班反映：黑龍江省大賚縣李家油房擁有許多蒙地，仍以實施「攬頭」（包攬工作者）制爲主；惟昔日親疏關係與權利義務既已失去，蒙地徵稅也就改頭換面，形成近代資本主義的剝削與奴役關係。[50]

---

46 如參事官制度在農民心中的印象，也是待訪要項之一。原本區長、縣長並無巡視村政的慣例，而調查報告指稱：滿洲國參事官制度成立以後，農民對於參事官來村表示歡迎態度。滿洲國大同學院圖書部委員編，《滿洲國鄉村社會實態調查抄》，頁 475。

47 滿洲國大同學院圖書部委員編，《滿洲國鄉村社會實態調查抄》，頁 381-391。鄧鐵梅係鑲紅旗滿族，「九．一八」事變後在鳳城縣組織東北民眾抗日救國自衛軍，生平見李林，《滿族宗譜研究》（瀋陽：遼瀋書社，1992），頁 203-208。

48 滿洲國大同學院圖書部委員編，《滿洲國鄉村社會實態調查抄》，頁 1568。蘇炳文係遼寧省新民縣人，保定軍校第一期畢業，1925 年進入東北軍，「九．一八」事變後堅決抵抗日軍，一度撤逃至蘇聯，後 1933 年 2 月返國曾任上將軍事參議官。樊蔭南編，《當代中國名人錄》（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1），頁 453-454；John Benjamin Powell, *Who's Who in China: Biographies of Chinese Leaders* (Shanghai: The China Weekly Review, 1936), p. 209;〈蘇炳文等經歐洲回華〉，《大同報》，1933 年 4 月 6 日，第 2 版。

49 滿洲國大同學院圖書部委員編，《滿洲國鄉村社會實態調查抄》，頁 947。

50 滿洲國大同學院圖書部委員編，《滿洲國鄉村社會實態調查抄》，頁 1069。這也使得後來針對蒙地問題，殖民當局改以「奉上」政府爲由，進行土地改革。相關研究可見広川佐保，《蒙地奉上：「滿洲国」の土地政策》（東京：汲古書院，2005）。

此次調查還刻意訴諸現代醫療的效能，將其引入見學過程中。報紙描寫「爲臨時施診捨藥、救濟各農村病者，各班均帶醫藥品」，[51]顯示殖民者的寬大爲懷與慷慨。兩件衛生事務亦呼應此一情形。首先是奉天省綏中縣朱仙屯村，當地河川經常氾濫，村民因水質欠佳，多患染砂眼。由於缺乏診治的場所及人員，民眾經常就近往土地廟祈求神明醫療，並以線香盥洗病眼。報告書說到：改善公共衛生習慣係屬急務，需納入當前宣撫工作之中。[52]第二件事爲第 15 班調查綏化縣津河鎮時，也透過隨行的醫療箱協助工作，還跟農民溝通，留存良好印象。[53]

《滿洲國鄉村社會實態調查抄》內的數字管理雖未必完整精確，卻對滿洲國的地政事業影響深遠。這群大同學院生畢業後，強調「指導」地方農事之必要，[54]屢以「救濟」、「振興」爲名向民眾徵收土地和課稅，[55]施行農物統制。這些舉措勢將造成地方若干不安。1935 年熱河省興隆縣代理參事官的北澤治雄（1911-?），因公布〈縣條例〉引發地主反抗，[56]即爲例證。與滿洲國實業部臨時產業調查局（簡稱「產調局」）的「北滿」農家調查相同，[57]大同學院的鄉村實態調查，替當局 1936 年爲掌握土地與權利關係的「地籍整理」計畫提供詳細之參考基礎，無怪乎時人提及滿洲農村土地分配時，都先引以爲據。[58]

---

51 〈大同學院生調查團即將出發分往各縣．實地練習與調查農村狀況〉，《大同報》，1934 年 6 月 30 日，第 7 版。。

52 滿洲國大同學院圖書部委員編，《滿洲國鄉村社會實態調查抄》，頁 241。

53 滿洲國大同學院圖書部委員編，《滿洲國鄉村社會實態調查抄》，頁 1337。

54 井上義人，〈滿洲國各縣農事指導員の重要性〉，《大亜細亜》，卷 3 期 4（1935 年 4 月），頁 38-42。

55 今井信一郎，〈農村救濟に關する意見書〉，《大亜細亜》，卷 3 期 4（1935 年 4 月），頁 34-37；權亢集，〈滿洲農村振興對策私案〉，《大亜細亜》，卷 4 期 12（1936 年 12 月），頁 21-32。

56 藤川宥二，《実録．滿洲国県參事官──大アジア主義実践の使徒》（大阪：大湊書房，1981），頁 82。北澤並非大同學院生，原係協和會相關人員，惟其例證頗能看出當時情況一斑。北澤治雄的簡歷，見中西利八編，《第三版滿洲紳士錄》，頁 1370。

57 有關此一組織對農村調查的情況，見長岡新吉，〈「滿州国」臨時産業調査局の農村実態調査について〉，《経済学研究》，卷 40 号 4（1991 年 3 月），頁 1-25。

58 以下兩書都有類似的說明。東亞問題研究會編，《滿洲國產業要覽》（東京：三省堂，1939），頁 34；伊東岱吉，〈東亞共榮圈と滿洲經濟の建設〉，收入慶應義塾高等部學術研究會編，《大東亞の社會と經濟》（東京：北隆館，1943），頁 169-170。

（二）計劃經濟中的「農村建設」

因應日本國內「二・二六事件」的時局變動，軍事化體制牽動帝國圈的社會與經濟，邁向法西斯主義（Fascism）之途，身爲「非正式帝國」的滿洲國自不可免。1937 年 7 月盧溝橋事件後，中、日邁入準戰爭狀態；滿洲國防範未然，先於帝國日本實施「統制經濟」（controlled economy）。以石原莞爾（1889-1949）爲首推動的〈滿洲產業開發五年計畫〉，既要滿洲國自給自足，還要爲日本提供資源，並肆應對蘇聯作戰的需求。[59]其中，農產品統制更列入要項，「開發農村」遂成爲主要目標之一。

事實上，爲求基層發展，滿洲建國後至少實施三次大規模的農村調查，以農民爲訪查對象，派員隨同警察前往，並完成報告書。[60]與此同時，大同學院的課程也改弦易轍，結合兩部院生進行全滿農村調查。[61]雖然三次大規模農村調查係由官方主導，我們很難斷定其與大同學院的互動關聯，不過後者配合政策而因應，殆無疑義。接著，要再從 1938 年出版的《滿洲農村之實態》，來觀察基層社會調查到底有何變化。

這部專以農村爲題的報告書，內容幾乎與前述數種的性質相仿，功能俱爲大同學院生增進地方行政之瞭解，還有體認民情和施政參考。在篇幅約達 415 頁的《滿洲農村之實態》裡，強調「農村建設」係滿洲國第二期產業開發中最爲重要的課題。爲了配合官方政策，大同學院的「農業經濟演習班」安排調查工作，由第 1 部第 9 期及第 2 部第 7 期等 16 名院生共同組成，目的地是距新京南方不遠的三個村落──劉家屯、向陽堡、長春堡。[62]演習班稱此番活動乃

---

59 石原莞爾，《國防政治論》（東京：聖紀書房，1943），頁 144-145。

60 原覺天、伊藤武雄、三輪武、浅田喬二等訪問，〈「滿洲」農村実態調查遺聞〉，收入井村哲郎編，《満鉄調查部──関係者の証言》（東京：アジア経済研究所，1996），頁 46-47。這些主要由國務院授命經調會負責。

61 譬如結合第 1 部第 8 期及第 2 部第 6 期共兩百餘名的院生，分爲 10 班，展開爲期一週的活動。〈大同學院學生實地調查農村〉，《大同報》，1937 年 8 月 26 日，第 14 版。

62 大同學院第一部第九期生農業經濟演習班編，《滿洲農村の實態──中部滿洲の一農村に就て》（新京：滿洲帝國大同學院，1938），〈例言〉，頁 5-6。實際上整本報告書關於長春堡的部分極少，一般調查幾乎都集中在另外兩個村落。

借鑒產調局的經驗，分成「戶別調查」與「一般調查」兩種；前者以選定戶數進行，後者則隨機取樣，目標在於評估農產增值五年計畫、農事合作社以及日本移民等之可能性。由此可知，此一結合「農村建設」理念的調查，蓋為肆應滿洲新局而來。

至於選擇「中部滿洲」為區域，係對「滿洲經濟論爭」而發。[63]演習班稱往昔大同學院的調查多以「南滿」為主，少數涉及松花江以北、興安嶺以南範圍一帶，但這些活動幾乎忽略了新京附近情況，有其不足之處。另一方面，殖民當局認定「北滿」為滿洲國的穀倉地帶，而「南滿」屬經濟上較早開發之區，因此各具農業、商業特色，功能不一；即便受到農業恐慌的波及，也有地域、程度方面之異。為進一步釐清農事合作社及其運作功效，演習班決定折衷兩種生態，考察不同的社會類型，故「中部滿洲」實為理想的調查地帶。[64]

儘管離國都新京未遠，但「農民的政治態度究竟如何」，仍為大同學院調查的一項重要選題。參與工作的院生異口同聲道：農民對行政機關的認識依然淺薄。某位張姓地主甚至誤認滿洲國撤廢治外法權後，政府機關俱已遷往東京；[65]這件趣談頗令院生驚訝，更感致力農村行政誠屬當務之急。此外，百姓普遍對軍警的印象欠佳。報告書上說：地方農民不明瞭軍隊駐紮之目的何在，也對警察的職權缺乏好感，態度上反不若尊奉村內的差役。[66]

為了理解當地產權的沿革，演習班充分利用《東三省政略》、《大清會典事例》等文獻，並留意滿鐵調查部的舊慣調查、矢野仁一（1872-1970）的蒙古研究，且加上地主訪談結果。《滿洲農村之實態》細數各種農業經營、土地

63 此一論爭來自 1934 年至 1935 年間，由大上末廣與中西功兩人針對滿洲經濟的認識進行論辯，雙方對滿洲性質農業與土地關係提出解決辦法。浅田喬二，〈「満州経済論争」をめぐる諸問題〉，《駒沢大学経済学論集》，卷 14 号 1（1982 年 6 月），頁 33-79。

64 大同學院第一部第九期生農業經濟演習班編，《滿洲農村の實態──中部滿洲の一農村に就て》，頁 40。

65 大同學院第一部第九期生農業經濟演習班編，《滿洲農村の實態──中部滿洲の一農村に就て》，頁 386。

66 大同學院第一部第九期生農業經濟演習班編，《滿洲農村の實態──中部滿洲の一農村に就て》，頁 387。

模式之外，還著手探討勞動僱傭關係。復次，報告書描述到平日農民借貸、販賣和購物的情形，認爲他們過度倚賴當鋪、糧棧、儲蓄會等金融組織，反致負債缺口日益擴大。檢討各種賦稅時，院生也提及地方基層擔負自衛團或保甲費用，說 1933 年 12 月施行〈暫行保甲法〉後，亮名塔（向陽堡）、劉家屯的農民支付地方的團費，顯然比其他稅收更加沉重。這些狀況與都市住民有天壤之別，誠值思量。[67]

大同學院被譽爲「全滿各地先造幹材的所在」，[68]農村動態固然未必是惟一調查的內容，不過確有促成院生「返原任服務時之一助」的用意。[69]如此「預（豫）習調查」活動後來傳承到吏員訓練上，包括現地考察；[70]即連內蒙建立傀儡政權之際，亦實施同樣工作。[71]接下來有必要分析：這些「鄉村社會調查」、「農村建設」的背後理念究竟爲何？

四、村政實驗及建立模範

前述社會調查發現：殖民當局有意打造滿洲爲「農本」國度，配合產業開發政策之需。當體驗農村生活的大同學院生們陸續擔任縣參事官後，[72]他們藉

67 大同學院第一部第九期生農業經濟演習班編，《滿洲農村の實態──中部滿洲の一農村に就て》，頁 282-285。

68 引文來自〈大同學院生視察撫順．一行一百五十人〉，《大同報》，1939 年 5 月 2 日，第 5 版。

69 〈大同學院生來吉實習〉，《大同報》，1938 年 7 月 8 日，第 7 版。本文所引各種大同學院報告書內提到自衛團、蒙地徵稅、醫療對殖民的輔助作用等，日後對縣政實施如何體現？這可從若干親歷者的回憶錄理解。惟受限於篇幅，且與本文題旨有別，以下僅述相關部分，其餘有俟容後專文再敘。

70 所謂「預（豫）習調查」是大同學院方面的講法，可見〈近畿農村實況．四門李村最佳住民和靄樂業．大同學院學生調查〉，《大同報》，1939 年 7 月 4 日，第 10 版。有關推動街村制時吏員訓練的情況，見〈爲澈底明瞭農村實態．訓練所生派赴現地考察．民眾指導人材須先有體驗〉，《大同報》，1940 年 6 月 9 日，第 6 版。

71 〈蒙疆調查農村實態〉，《大同報》，1940 年 10 月 17 日，第 11 版。

72 大同學院生畢業後歷經職務輪調，基本上以充任縣級參事官的比例最多。茲依統計調查，第 1 部的前兩期畢業院生派往中央政府機關任職的有 51 位，而派往各地機關（含中央、地方省縣市）的有 138 位，因故無法到職的有 15 位。據此可知，有 67％是負責省、縣級參事官的工作。里見甫編，《滿洲國現勢（建國──大同二年版）》（新京：滿洲國通信社，1933），頁 148。

由重建農業、樹立理想社會等宣傳，擴大殖民活動的地方基礎。[73]許多倡導「新鄉約」運動與建設「模範村」口號，[74]也在此一背景下應運而生，成爲新興風氣。[75]

（一）來自「新村運動」與「鄉建」理念的啟示

如此情形可回溯自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新村主義」與「鄉村建設」理念。眾所周知，廿世紀初受克魯泡特金（Pyotr A. Kropotkin, 1842-1921）「互助論」（mutual aid）和托爾斯泰（Lev N. Tolstoy, 1828-1910）「泛勞動主義」（pan-laborism）所影響，東亞掀起一波波無政府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思潮，其中由「白樺派」作家武者小路實篤（1885-1976）等人倡導的「新村運動」，[76]備受各方矚目。他們挑選一處共同勞作的園地，推行互助合作、要求平等分配的社會體制。新村運動曾引發廣泛注意，在中國連周作人（1885-1967）都有文字介紹，並且獲得正、反兩面評價，[77]儘管最終沒有開花結果，卻帶動風潮。許多「你方唱罷我登場」的追隨者便致力於地方行政與教育事業，如 1930 年代梁漱溟（1893-1988）、晏陽初（1893-1990）、黃炎培（1878-1965）等人提出「鄉治」口號，[78]可視爲同聲共氣之舉。誠如前述，建立滿洲新政權與「農

73 建立如此「農本」國家的理念，可以縣參事官樹立農業合作社爲例。像第 1 部第 4 期的藤川宥二於 1940 年夏天前往撫松縣擔任副縣長，即把人蔘生產、販賣乃至資金借貸等產銷管道納入合作社體系來完成。據稱該縣年產人蔘數量約佔滿洲六成，然實際銷售概由營口商人掌控；他們經常與旅店結合來哄抬售價，又借貸給種植農民，形成惡性循環。於是藤川銳意改革，避免中間商人剝削，並強化殖民者的力量。大同学院史編纂委員会編，《大いなる哉 · 滿洲》，頁 192-193。

74 石田武夫，〈新鄉約運動の提唱〉，《大亜細亜》，卷 4 期 4（1936 年 4 月），頁 19-23；井上實，〈農本建設の起點 · 模範村の經營につき〉，《大亜細亜》，卷 3 期 3（1935 年 3 月），頁 2-9。

75 井上實，〈滿洲農村社會に於ける新興樣相と其發展〉，《大亜細亜》，卷 3 期 6（1935 年 6 月），頁 2-9。

76 直木孝次郎，《武者小路実篤とその世界》（東京：塙書房，2016）。

77 中山義弘，〈五四運動期における「新しき村」の試み〉，《北九州大学外国語学部紀要》，通号 40（1979 年 11 月），頁 1-37。

78 Guy S. Alitto, *The Last Confucian: Liang Shu-ming and the Chinese Dilemma of Moderni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 pp. 199-206；新保敦子，〈梁漱溟と鄉村建設運動——山東省鄒平県における実践を中心として〉，《日本の教育史学：教育史学会紀要》，

村破產」的論述相關，而落實符合殖民理念的農村建設，更成為政策推行重點之所在。

如此原則具體而微地展現在「實驗村計畫」中。這項提案發想於 1934 年至 1936 年間，係由奉天省公署主導。報載其主張：

> 舊政權時代受特權階級及秕政之苛虐，結果農民困窮，喘喘不寧，當以施食、放款救濟之，根本剷鋤從前已成之經濟組織，即將指導農民之個人的自由主義，改成公共團體之一員，互相扶助。據鄉鄰友愛之精神，成立全體的共同思想之基礎組合制度，建設大模範村，而導之樹立前進的農村經濟大系云。[79]

引文說「將指導農民之個人的自由主義，改成公共團體之一員」，顯見意圖整編農村，將之納入統制經濟的環節之下。參與該項計畫的靈魂人物——奉天省次長竹內德亥（1888-1946）——聲稱：「農村破產」早為刻不容緩的課題，此前無論山東、河北各省的農村，抑或日本國內、殖民地朝鮮等處，均有類似工作，也累積了不少經驗。只不過，滿洲國內有近八成的居民從事農耕，倚賴此業維生，因此奉天省府始有籌劃實驗村的構想。竹內認為就像科學家在實驗室裡操作那般，重建農村光有理論尚不足以解決，必須採取實作才行。[80]

實驗村方案固不免含有殖民當局的設想，既要強調日、滿關係不可分，又要以「東洋道德」為基調，實現「民族協和」精神。綱領〈奉天省實驗村建設

通号 28（1985 年 10 月），頁 92-109；池楨，〈「桃花源」、「美國夢」、「萬能藥」與「烏托邦」——20 世紀 30 年代中國的鄉村建設實驗〉，《史林》，2013 年第 5 期，頁 113-120。

79 〈設立建設籌備委會．普及模範村．俟議定大綱移交省府核奪〉，《大同報》，1935 年 11 月 24 日，第 11 版。個別標點偶有更易。

80 竹內德亥，〈奉天省實驗村建設の意圖〉，收入岩崎久男、山崎寿，《大陸の村つくり》（新京：奉天省興農合作社聯合會，1940），〈附錄〉，頁 216。竹內德亥係青森縣人，1914 年東京帝國大學法科大學政治學科畢業生，在滿洲國成立之前曾為關東廳理事官、關東廳警視兼事務官、大連民政署長等職。1932 年起，他受到拔擢而擔任民政部理事官暨總務司長，1938 年 7 月成為奉天省次長。日本敗戰後，竹內協助日人救濟事務，是長春日本人會副會長，後遭中共公審槍斃。其生平參考內尾直昌編，《滿洲國名士錄．康德元年版》（東京：人事興信所，1934），頁 113；中西利八編，《新日本人物大系》（東京：東方經濟學會出版部，1936），頁 123；佐藤慎一郎，〈どたん場における人間学——敗戦．亡国．獄中記〉，《佐藤慎一郎選集》（東京：佐藤慎一郎選集刊行会，1994），頁 230-231。

之意圖〉一文提出的遠景是：政治上推動合理政績，確立行政體制，以實現「無所榨取」為目的；經濟上排除共產主義，導正資本主義，再認識農村協同體的精神，並恢復東洋傳統社會理念，以全能主義實行協同經濟。值得一提的是，完成這些口號尚須「指導員」專責帶領，其晉用的條件如下：（1）眞正瞭解農村協同自治體的理念；（2）對農業技術具有充分的認識；（3）能與農民共同起居，並一齊實踐生活，且對滿語（即漢語）通解者。[81]

最後奉天省府擇定以瀋陽縣古城子村、蓋平縣和尚村、海龍縣太平村、梨樹縣儉富村等四處為「村政實驗」的模範村。[82]根據綱領，實驗村具有共通性：（1）交通居於中心樞紐位置；（2）村落以農業為主，避免漁村或山村，以供示範；（3）住民需移居一段時間，有其在地基礎；（4）村內族群並無多元複雜之性質；（5）經濟層面少有階級差別；（6）擁有雄厚商業資本及相關活動；（7）當地較少突發狀況，如天災、地變等。[83]此外，用來對照前後施政，作為宣傳，亦是遴選考量。像 1933 年 9 月蓋平縣有「粥鍋」賑饑救急之例，[84]而縣內和尚村歷經「實驗」後，可供參照。至於瀋陽縣古城子村之「古城」，意味著「古老村莊」，而非「進步村莊」；改造成模範村後，多少含有改變的意涵。[85]

（二）設立縣村模範的風潮

1934 年 11 月，古城子村率先被選為「農村教化建設」的示範，井關靜受派充任「指導員」，駐地為期一年。該村係屬中型農村，僅有 298 戶，人口共 1,831 位。這次的「教化建設」後來公開出版成果。[86]據井關個人事後的回顧，

81 竹內德亥，〈奉天省實驗村建設の意圖〉，收入岩崎久男、山崎寿，《大陸の村つくり》，頁 219、222。

82 〈奉省署模範村四處．擇定瀋陽、蓋平、梨樹、海龍四縣〉，《大同報》，1935 年 11 月 29 日，第 3 版。

83 竹內德亥，〈奉天省實驗村建設の意圖〉，收入岩崎久男、山崎寿，《大陸の村つくり》，頁 221-222。

84 〈蓋平縣公署行將設立粥鍋〉，《大同報》，1933 年 9 月 3 日，第 3 版。

85 藤田（記者），〈古城子模範農村を觀る〉，收入奉天省公署教育廳編，《農村教化建設指定村瀋陽縣古城子村教化建設狀況》（奉天：編者印行，1935），頁 41。

86 除了本文所引《農村教化建設指定村瀋陽縣古城子村教化建設狀況》一書外，另見〈瀋陽縣古城子村の教化建設（上）──農村教化建設指定村の狀況〉，《大亜細亜》，卷 4 期 9（1936

當初進行調查時，村民總對公務單位懷著敬而遠之的心態，不願講述內心話；即使是由保甲牌長充任調查員，村民仍經常以「沒法子」回應。[87]肩負「指導」重責的井關，想方設法地打破如此局面；他先以動員團體力量，期待改善村內公職吏員的行政效率，並鼓勵民眾改良農業設施。在教育方面，井關強調滿洲農村的特殊性，要百姓培養「愛鄉心」；學校經營以體認農民價值爲主，希望學生畢業後逕自投入開發農村的工作，要求村民抱持「我爲農村的學校、我爲學校的老師」之觀念。[88]

實驗村尤重教化宣導。譬如經常召開「通俗講演會」，向村民傳達政令；又成立農民教育館，放映有關「先進國家」的電影，啓迪民智；[89]且獎勵體育運動，改良娛樂習慣，打破陋習。值得留心是培養愛國觀，要求節慶時於公開場合懸掛國旗。[90]宣導工作還包括 1935 年 7 月 30 日至 8 月 8 日期間，特別找五名奉天省立農科高級中學的畢業生進行「夏季實習指導」，亦即現地實作，與教學內容互證。整個實驗村計畫冀望在農事教育上，讓學生體察「勤勞至上」之意，同時啓蒙農民，從中知悉嚴守時間、秩序和規律的重要。總之，主要以「認識農村」爲目的。[91]

這個以「教化」精神爲號召的模範村，備受各界重視，瀋陽縣長曾偕員赴往考察。[92]但治人與治於人的立場終究有別，看法大相逕庭。由於經常需要動員群眾，村民普遍對政策的評價負面，乾脆諧音戲稱爲「麻煩村」。[93]但無論如何，這是殖民當局對農業社會構築未來藍圖、如何自力更生的一次試煉；奉

年 9 月），頁 80-86；〈瀋陽縣古城子村の教化建設（下）──農村教化建設指定村の狀況〉，《大亜細亜》，卷 4 期 10（1936 年 10 月），頁 72-78。戰後有關農村教化建設指定村也被視爲滿洲國參事官工作的重要業績。藤川宥二，《実録・満洲国県參事官──大アジア主義実践の使徒》，頁 79。

87 井關靜，〈古城子村教化建設の後を顧みて〉，收入奉天省公署教育廳編，《農村教化建設指定村瀋陽縣古城子村教化建設狀況》，頁 8。

88 奉天省公署教育廳編，《農村教化建設指定村瀋陽縣古城子村教化建設狀況》，頁 4-6、8-9。

89 〈瀋縣模範村古城子來年設農民教育館〉，《大同報》，1934 年 2 月 18 日，第 3 版。

90 奉天省公署教育廳編，《農村教化建設指定村瀋陽縣古城子村教化建設狀況》，頁 13-14。

91 均見奉天省公署教育廳編，《農村教化建設指定村瀋陽縣古城子村教化建設狀況》，頁 27-30。

92 〈尹縣長考察模範村〉，《大同報》，1935 年 11 月 12 日，第 3 版。

93 奉天省公署教育廳編，《農村教化建設指定村瀋陽縣古城子村教化建設狀況》，〈緒言〉，頁 8。

天《每日新聞》記者形容這是場「令人注目的全新運動」。[94]而堅持打造「新村」的夢想，並未在一年內戛然而止，持續由蓋平縣推行。[95]

蓋平縣和尚村的實驗示範始於 1936 年 4 月。據計畫書揭示，其原則在「貫徹建國精神與發揚東方道德」，培養有關義務、犧牲等觀念。[96]整個工作規劃以五年爲期，各期名稱及目標進度有如表 1。

表 1　蓋平縣和尚村第一期五年計畫各年度實驗村建設的具體事項

時間	年度	名稱	具體內容
1936	一	保甲制度強化期	宣撫工作、實態調查、預算檢討、樹立教育體系、活用保甲制、開設道路
1937	二	村行政確立期	確定村界、組織青年團、鄉土化教育、改善衛生、組成合作社
1938	三	產業振興期	新行政體系建立、設立或合併學校、綠化運動
1939	四	組合組織期	以「牌」完成行政工作、教育及娛樂機關的常態性活動、合作社運作、大清河治水工事
1940	五	全蓋平建設及協和具現期	訂立模範的實驗村、村民精神鼓舞、講習會的教育活動、衛生防疫工作

資料來源：岩崎久男、山崎寿，《大陸の村つくり》，頁 10-19。

第一年度雖名爲保甲制「強化期」，實際上仍強調「活用」，即充分利用地方既有資產，拿村民的土地和資金興築各項建物，如村公所、辦事處與小學校舍等。[97]至於稅收來源，則依戶口調查造冊，通過「屬地主義」確立產權，最終達成「交上錢糧不怕官」的納稅觀念。[98]有關行政革新是禁止吸食鴉片、

[94] 藤田（記者），〈古城子模範農村を觀る〉，收入奉天省公署教育廳編，《農村教化建設指定村瀋陽縣古城子村教化建設狀況》，頁 41-49。
[95] 井關靜，〈古城子村教化建設の後を顧みて〉，收入奉天省公署教育廳編，《農村教化建設指定村瀋陽縣古城子村教化建設狀況》，頁 16。井關氏的回顧以「新村」兩字總結其成果。
[96] 蓋平縣和尚村公所，〈實驗村建設記錄（上）．康德五年施設計劃書〉，《大亜細亜》，卷 6 期 8（1938 年 8 月），頁 25。
[97] 岩崎久男、山崎寿，《大陸の村つくり》，頁 24。
[98] 岩崎久男、山崎寿，《大陸の村つくり》，頁 26-29。

嗎啡等不當藥物，以及管束不良青少年，運用連坐法來監督；甚至嚴加取締任何不利基層社會統治之舉，包括民眾衝突情事，還有避免任何流言蜚語孳生。

對於「開發農事」方面，和尚村積極勸誘民眾務農。殖民當局甚至要求地主從外地歸返，並動員保甲制協作農務，如要求村民依警指示，負責修繕村內道路、建設公共土木工程，「自力復興」大清河，預防水患。[99]另外，又列舉幾個「更生」的案例，包括地主、虛無青年及無業夫婦等，強調他們因農作重生。[100]教育上除培養勤勞與愛鄉心外，值得一提的是強化青年對農村的影響。實驗村內設有「青年訓練所」，每值夏、冬時農閒，安排一週三天召集學校青年前來上課，傳授修身、公民、產業、訓練及勞動等課目，[101]並以協和會的《青年讀本》為教科書，培育村內中堅分子。[102]

從第二年度開始，實驗村計畫旋因不同產業發展需求，陸續加入其他日本移民。1937 年 1 月，還擴及蓋平縣內的暖泉、團甸兩村，由水野敏夫、伊東三郎充任指導員，專責柞蠶和畜產工作。接著同年 6 月，日本國內前來的兩位青年下平正剩、野村茂人，被分配至蘆家屯、萬福莊，開啓改革村政事業。直到 1938 年 3 月，歷經各指導員與縣幹部的協議後，以上述五村為據點再分為三區，進行以奉天省為範圍的「全建設運動」。[103]

同時期間，建立模範村的類似構想其實遍及滿洲國各地，甚至包括朝鮮族村落。[104]有些縣分不僅設置委員會「改善地方不良之務」，還編列預算，以縣長、參事官為正、副委員長，又指派「村指導」監督。[105]從古城子村、和尚村

99 岩崎久男、山崎寿，《大陸の村つくり》，頁 103-104。

100 岩崎久男、山崎寿，《大陸の村つくり》，頁 33-37。

101 岩崎久男、山崎寿，《大陸の村つくり》，頁 56-58。產業開發結合青年教育，也成為學校裡不可或缺的一環。蓋平縣和尚村公所，〈實驗村建設記錄（上）．康德五年施設計劃書〉，《大亜細亜》，卷 6 期 8，頁 26。

102 岩崎久男、山崎寿，《大陸の村つくり》，頁 87-100。

103 岩崎久男、山崎寿，《大陸の村つくり》，頁 3-5。

104 報紙甚至還宣傳「蘇境鮮人，遂有向王道普照之我國開始移歸者」。〈吉林省東部地方鮮農模範村〉，《大同報》，1934 年 12 月 8 日，第 11 版。

105 如奉天省的瀋陽縣、安東縣，乃至北滿的濱江省。俱見〈為整理各村事務進展．劃十三模範村．俾資各村有所遵行〉，《大同報》，1934 年 8 月 30 日，第 3 版；〈濱江所屬巴彥縣設立模範村．委員會成立各項逐漸進行〉，《大同報》，1935 年 7 月 30 日，第 3 版；〈濱江省屬各縣

的個案大致可獲悉：滿洲國如何由模範村口號，逐步達成殖民當局對地方基層的滲透，雖然其中效能亟待更多史料驗證，但被公開周知則係不爭事實。以和尚村爲例，長春縣米沙子村特派三位優秀職員赴往取經；又時任建國大學教授的西元宗助（1909-1990），[106]親臨當地瞭解教育活動；甚至連山東省的村治運動家也都慕名前來。[107]各種盛讚帶來的效應，也促使株式會社滿洲映畫協會以和尚村爲題，拍攝官方宣導的影片。[108]

五、戰爭動員體制中的「教化」

檢視滿洲國各地建設模範村的風潮，有助於思考殖民者如何藉由統治理性建立合法基礎。隨著中日戰爭展開，爲了積極動員民眾，1937 年 12 月滿洲國更推動「街村制」，[109]改革地方保甲組織。在「指導」的大纛統攝之下，農村各項有關糧食徵收、風俗改良、教育普及、畜產繁殖、官民融合等方針，統由官方派員規劃安排。[110]至於原來的振興政策則改弦易轍，以配合統制的增產和

設立十模範村．經費擬定令即實行〉，《大同報》，1935 年 10 月 11 日，第 3 版；〈指定五龍背爲模範村．中央撥款建設．安東縣署成立委員會〉，《大同報》，1935 年 12 月 7 日，第 4 版；〈安東省署派員勘查．指定模範村落〉，《大同報》，1935 年 12 月 10 日，第 3 版；堤，〈濱江省の新鄉村制度案について〉，《滿洲評論》，卷 11 號 22（1936 年 6 月），頁 5-7。

106 西元宗助是鹿兒島人，1929 年入京都大學文學部哲學科，專攻教育學，1932 年畢業。1940 年他前往滿洲國的建國大學任教，戰敗後至 1949 年曾受俘於西伯利亞，歸日本後始在京都府立大學執教鞭。東眞行，〈旧ソ連領被抑留者における「収容所の親鸞」── 西元宗助と石原吉郎をめぐって〉，《現代と親鸞》，卷 42（2020 年 7 月），頁 9-10。

107 俱見〈長春縣使行政改善．將於管下設實驗村〉，《大同報》，1942 年 1 月 17 日，第 2 版；中田晃，《燈影莊物語》（京都：一燈園出版部，1972），頁 131；滿洲国史編纂刊行会編，《滿洲国史．各論》（東京：滿蒙同胞援護会，1971），頁 186-187。

108 〈滿映文化片「和尚村」將完成〉，《電影報》，1941 年 10 月 1 日，第 1 版。該片是由上砂泰藏編導，玉置信行、南田常治攝影，主要使用的語言爲漢語。見胡昶、古泉，《滿映 ── 國策電影面面觀》（北京：中華書局，1990），頁 133。

109 「街」是以都市（人口 20,000 以上）爲主，而「村」係指農村部落（戶數約 1,000 戶，耕地達 40,000 畝以上），於各省、市縣旗設立實驗村、模範村、指定村等。解學詩，〈僞滿洲國的政權體制和基層社會組織〉，收入楊天石、庄建平編，《戰時中國各地區》（北京：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頁 20-21。

110 〈促進農民自治事業．設置模範實驗村．省方已會議決定進行要綱〉，《大同報》，1940 年 2 月 3 日，第 7 版；〈在大孤家實驗村舉開農村研究會．省縣派專員前往指導〉，《大同報》，1938 年 7 月 28 日，第 3 版。

提供勞動力之「自興村運動」爲主。[111]要瞭解地方從「振興」到「自興」的改變過程，宗教團體的「教化報國」是一值得觀察之面向。

「教化報國」雖係由宗教團體發起，但無可諱言仍由官方居間主導和籌畫。民間信仰在中國東北（滿洲）地區傳布始終是眾多研究的關注焦點之一。近人指稱：殖民當局先以寬鬆的態度對待，接著對宗教組織加以控制和打擊，並利用日本的宗教進行整合，最終以符合統治原則爲目標。[112]另有學者認爲：探討民間信仰於滿洲的傳布，應以更寬泛的視角加以釐清。好比民族主義那般，統治者並非純以行政規章、法令達其成效，反倒藉由各種理念、實踐及制度等發揮影響力。[113]包括傳教士、社會活動家乃至旅遊者的商業出版品，都共同顯現了宗教團體、慈善組織如何協力國策，達成「教化」使命。他們形成一群「話語共同體」（discourse community），並建立起人際網絡，以符殖民統治之需。以下試舉幾個信仰團體的宗教活動，說明地方治理及其性質。

（一）宗教如何成為傳頌殖民治理的媒介

先以長春縣的「小八家子村」爲例。該村昔爲蒙古牧場，因土壤肥沃、牲畜膘壯，更位處新京附近，故打造成「模範」特具意義，足爲「他縣工作之前車」。1934 年 3 月滿洲國宣布施行帝政後，協和會開始與警政單位密切聯繫，忖量如何在此進行建設。由於小八家子村自近代以降便移入不少墾民，還有法國天主教的神父長居當地，故傳教事業發達。[114]報載那裡有 300 戶住民，人丁約共二千餘名，「全村朝夕唱讚美歌，休息日著黑衣而赴禮拜堂聽講，成奉基

111 主要採取集中主義的模式，以昂揚技術的指導部門爲目標。舉凡各行政機關、協和會、合作社等活動均以自興村爲中心而展開。〈斷行農村振興方策．設自興村擴充農產．立試驗場積極養成技術人材〉，《大同報》，1942 年 4 月 18 日，第 6 版；滿洲国史編纂刊行会編，《滿洲国史．各論》，頁 192-193。

112 如以基督教爲例，可見徐炳三，《「扭曲」的十字架——僞滿洲國基督教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18），頁 135-140、147-166、184-189。

113 Thomas David DuBois, *Empire and the Meaning of Religion in Northeast Asia: Manchuria 1900-194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 11-13. 作者主要是以法律層面爲探討對象，分析宗教團體的功能。

114 Ji Li, "Catholic Communities and Local Governance in Northeast China," *China Review*, 18:4 (November 2018), pp. 110-111.

督之集合體，是爲教徒捨身拚命宣化眾生之結果」。伴隨洋人宣教事業，村內充斥現代化的設備如電燈、無線電、裝甲汽車等，加上新式教育影響，結果「無吸鴉片與賭博者，眞見和平之境」。

殖民當局在此一基礎之下，有意將小八家子改造爲「特殊自治村」；協和會分派百餘名「指導員」從事相關工作。記者目睹如此情形，描寫到：

> 全村相應，併連絡近村行之；如行保甲、整交通、收槍砲，均協力服從，舉官民調協之實績，為他縣之模範焉。

另外像舉辦日、滿兩國學生的交歡會，還有各項講演、播放電影，乃至鋪設通信、整備道路等活動，都被傳媒放大，成爲現代的標竿。[115]

從小八家子村的例證可見：街村制實施以前，殖民者仍企望予以協助「指導」，改革縣村行政以利統治，惟宗教尙未納入整體施政之一環。不過當戰爭展開後，宗教組織則完全加入動員之列，其信仰更成爲教化民眾的方式。

且讓我們再回到歷經實驗的和尙村個案上。雖然擔任該村「指導」行政工作的是縣參事官岩崎久男（1903-?），[116]但實際代表人物爲山崎壽、松浦鐵夫兩位。他們的確切身分惜乏資料，無從得悉；僅知兩人帶領各自家族渡滿前來，均係京都「一燈園」的修行者，[117]以推崇勤奮、奉仕生活爲宗旨。據云山崎壽平日和村民打成一片，甚得地方人士敬仰；直到二戰結束，其一家妻兒仍受村民戮力保護，終以平安返抵日本。[118]何以一位身負殖民任務、參與協助實驗村工作的日本移民者有如此結局？這可從一燈園創始者西田天香（1872-1968）的故事，探索箇中緣由。

115　引文俱見〈國都近郊模範村（下）‧遊小八家子聞睹錄〉，《大同報》，1934 年 11 月 21 日，第 11 版。

116　岩崎係東京人，歷任日本陸軍武官秘書（南京）、日本憲兵隊囑託（上海）等職，1933 年進入滿洲國後，先後擔任拜泉、蓋平各縣參事官。中西利八編，《第三版滿洲紳士錄》，頁 335。

117　「一燈園」是 1904 年西田天香所創辦的宗教團體。該團體力倡人類應該自然地生活，原本生來一無所有，就不該爲了生活而工作，且隨時存有懺悔之心，實行無條件的奉獻。有關其宗教信仰，見 Winston B. Davis, *Japanese Religion and Society: Paradigms of Structure and Change*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2), pp. 189-225.

118　岩崎久男，〈県行政と実験村〉，收入滿洲回顧集刊行会編，《あゝ滿洲》（東京：編者印行，1965），頁 144。

1939 年 11 月 11 日，西田天香獲邀造訪和尙村。這是他第二次前來，除了想瞭解當地行政的具體成效外，還被當局特別安排跟鄰近的十餘名村長座談。這場可謂「別開生面」的談話會，到處充滿殖民宣傳；村長們分別談到爾近生活，還言及實驗村建設前後的差別。其中一位代表講述到民生問題，說：拜一燈園餘蔭所賜，自己的生活比起先前要更爲豐足多了。恭維之餘，會中也刻意凸顯一燈園的角色，讚譽其猶如「世界大宗教」。接著西田申論一燈園的終極目標，不單爲了傳布宗教思想而已，更重要者是想促進社會各階層平等，迎接眞正的和平到來。基於如此「救贖」理念，西田宣稱：協助實驗村的建設工作，即是把宗教信念投射到現世生活裡；而一燈園所要傳達的世界和平準則，無異替日、滿兩國的關係奠定基礎。他更形容山崎壽個人的角色，恰如在滿洲國的日本官吏一樣，是毫無私心地要帶領大家投入的。[119]

姑不論這段話的眞面目爲何，惟利用「傳道」頌揚殖民的合理與正當性，目標昭然若揭。宛如日本佛教日蓮宗的操作般，[120]西田天香抬出世界文明與「東洋和平」等普世價值，高唱日本絕非侵略者身分。他企望「打造和尙村成爲世界一心一德的範本」，說這也是對日本總理的承諾。[121]在另一場對著將近兩百餘名村民的演說中，西田更運用了傳統中國的思想資源，好讓被殖民者理解自己身處於「現世烏托邦」。他高舉古代堯舜的生活，比附爲一燈園現況，說這是今後全滿洲國都應效習的典型；惟有如此，眞正的和平世界方能到來。最後，西田提醒大家有兩件事需要念茲在茲：一是彼此切勿爭執衝突；一是人世間生活，既非資本主義也不是共產主義，而是介於兩者間的大道。[122]

---

119 中田晃，《燈影莊物語》，頁 135 。

120 近人指稱石原莞爾的「東亞聯盟」運動中結合日蓮信仰，即訴諸於民族國家、國族認同、城鄉差距、性別平等等議題，藉此來創建現代性的烏托邦。G. Clinton Godart, “Nichirenism, Utopianism, and Modernity: Rethinking Ishiwara Kanji’s East Asia League Movement,” *Japanese Journal of Religious Studies*, 42:2 (January 2015), pp. 235-274.

121 中田晃，《燈影莊物語》，頁 136-137。

122 中田晃，《燈影莊物語》，頁 139-140。

（二）社會滲透和「教化報國」講演

西田天香的陳述，不禁令人想起宗教與政治間錯綜複雜的連結。[123]這裡不妨先溯明日本對宗教的態度及變遷。大致說來，明治中葉日本已確立基督教、佛教和神道之地位，並以「迷信」爲由取締社會上各種降神附體的儀式。直迨 1919 年 3 月，更以「類宗教」（similar religion, 日文譯爲「類似宗教」）界定那些未經官方承認的民間信仰；1935 年 12 月又以「行政單獨處理方式」確認這些團體或組織。[124]至於對帝國以外的殖民地或佔領區，舉凡民間信仰都被看成類宗教而強加監控，每當危及殖民政權統治之際則予以彈壓。

從 1930 年代起，對類宗教的研究和關注也日漸影響日本學者，並擴及東亞地區的薩滿信仰。譬如朝鮮半島上，村山智順（1891-1968）即有相關討論；而中國方面，末光高義則注意到慈善組織的人際活動。[125]身爲「非正式帝國」的滿洲國，其實也採殖民政權劃分類宗教之作法，用來管理境內各結社團體。像根據有無「教祖」來加以認定；稱有教祖是「文化宗教」，而發生於不同種族、沒有教祖的則爲「非文化宗教」。[126]饒富趣味的是，如此含帶偏見的概念，更成爲區隔中國宗教、協助殖民統治的策略。1937 年 4 月，國務院治安部將任何「不當」宗教結社通通納入警政系統的監視中，發予許可證明；此外，又

---

123 早自中日戰事開啓後，西田便以日本最大的慈善教育團體代表，前往華北、滿洲國等地進行講演。報載學校教員甚至千餘名被動員參加盛會，表示歡迎。〈西田氏昨在師院講：武訓興學問題〉，《晨報》，1938 年 5 月 5 日，第 8 版；〈西田天香氏在奉講演〉，《大同報》，1938 年 5 月 12 日，第 3 版。

124 有關類宗教的簡要說明，見孫江，〈救贖宗教的困境──「滿州國」統治下的紅卍字會〉，《作爲他者的宗教：近代中國的政治與宗教》（臺北：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6），頁 157。

125 村山智順撰有《朝鮮類の似宗教》一書，相關討論見桂島宣弘，〈宗教概念と国家神道論〈帝国＝植民地〉を射程に入れて〉，收入磯前順一、尹海東編，《植民地朝鮮と宗教──帝国史．国家神道．固有信仰》（東京：三元社，2013），頁 144-148。至於末光的中國討論，見末光高義，《支那の秘密結社と慈善結社》（大連：滿洲評論社，1932）。

126 藤川壽桓，〈宗教與滿洲帝國（四）〉，《教化通信》，號 49（1943 年 10 月 15 日），頁 6。

仿效清朝的「度牒」辦法來管理，進行各種調查。被套上緊箍咒的宗教結社活動，此後搖身一變，成爲滿洲國官方「教化團體」和協助統治之工具。[127]

近人討論教化團體，除了強調其具備「現代特色」的東亞傳統外，還指出它們以一種曖昧的方式進行社會滲透，[128]從而營造緊密且鞏固之人際網絡。著名的「萬國道德會」在滿洲國活動，[129]乃至民間組織——青幫（在滿洲通稱爲「在家裡」）等，[130]均係顯例。當推行街村制以後，這些民間宗教和結社團體也配合殖民者意志，從事各項宣傳；其中最爲熱絡者，即各地「教化報國」的講演和活動。

1943 年有兩回大同佛教會的相關活動，頗可窺知滿洲國實施地方教化講演及其終極目標何在。第一次以黑龍江省雙城縣爲範圍，係由佛教會組成宣化班，以一個月爲期向縣內各村屯進行宣教。該場巡迴演說動員了縣公署、協和會、道德會的成員親自臨席，分就儲蓄報國、女子勤勞奉仕、增產節約、廢物利用等題說明。[131]另一次則由大同佛教總會擴大舉辦，聲稱在「蒙政府指導之下」，組織講演班與視察團赴各處從事宣化，演講目的在喚起民眾增產出荷、加強戰時生活改善及儲蓄報國，亦即徵集戰爭物資。此外附帶的運動是推廣識

---

127 孫江，〈救贖宗教的困境——「滿州國」統治下的紅卍字會〉，《作爲他者的宗教：近代中國的政治與宗教》，頁 163-165。有關滿洲國歷次的宗教調查工作，見楊家余，《內外控制的交合——日僞統制下的東北教育研究（1931-1945）》，頁 164-167。

128 Prasenjit Duara, *Sovereignty and Authenticity: Manchukuo and the East Asian Modern*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3), pp. 103-105.

129 萬國道德會成立於 1921 年，由山東省歷城縣人江壽峰發起，結合儒家、佛教、道教、基督教、回教等宗教義理，追求和平與振興道德爲宗旨。1928 年後改由杜紹彭、王鳳儀等人接手，加入地方義學組織，提倡性命倫理思維，後在東北與華北盛行。1933 年 12 月，滿洲國民政部批准將萬國道德會改爲教化團體，中央政府人士增韞、袁金鎧、程義明、趙連琪紛紛加入，總會設在新京。末光高義，《支那の秘密結社と慈善結社》，頁 215-248；劉晶輝，《民族、性別與階層——僞滿時期的「王道政治」》（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頁 24；朱允恭，《王鳳儀年譜與語錄》（臺北：萬國道德總會，1993），頁 223。

130 孫江，〈增上寺的香堂——1933 年東北青幫（在家裡）代表團訪日之行〉，《作爲他者的宗教：近代中國的政治與宗教》，頁 182-207。

131 〈教化旬報 · 大同佛教會宣化班在城縣各村屯講演續誌〉，《教化通信》，號 39（1943 年 7 月 5 日），頁 7。

字，掃除文盲與普及教育，最終期待「一般農民省悟自覺，踴躍爭先增產出荷，以達成教化報國之使命」。[132]

迄至滿洲國崩解前，這類教化講演活動未嘗間斷。結果不僅將結社團體與地方行政緊牢地扣在一起，也令中央得以滲透基層社會，強化其「地方基礎」。1944 年 5 月，一場爲期兩週、共分六班人員的「教化報國講演班」，透露其中意涵。這次活動係召集各教派社團，一齊組班講演，由滿洲基督教教會、五台山佛教總會等宗派領袖充任講員。每班參與成員除有三名講師之外，還有文教部或協和會的成員，分往奉天、吉林、濱江、安東各省的重要縣市。他們吸引地方百姓前來聆聽，鼓吹民眾提供獻金。[133]滿洲國政府官員大肆宣揚其中盛況，如吉林省通陽縣在當地民眾熱烈要求下，於午後安排兩場演說。[134]類似宣講辦法被如法泡製，道教總會也在文教部、協和會支持下，至本溪、撫順、西安、阜新、北票等礦區講演。他們以尊奉太上老君爲名，依託「老君是開礦的始祖」，並塑造「從事煤炭增產的戰士們的責任重大，不亞於前方勇士們」之社會形象。[135]

綜上言之，這正是利用宗教結社協助戰爭動員，藉由普世價值美化其侵略舉動，並建立起「道德的門面」。事實上，不僅既有的在地各教派、道德會與「在家裡」等團體，就連一燈園案例亦看到日本的類宗教組織如何被動員起來，共同參與建設新天地的工作。

---

132 〈大同佛教會講演班赴地方〉，《教化通信》，號 50（1943 年 10 月 25 日），頁 5。

133 關於這次的巡迴講演，有人還隨行撰寫相關報導。李振遠，〈教化報國講演班隨行記（一）〉，《教化通信》，號 69（1944 年 5 月 5 日），頁 5；李振遠，〈教化報國講演班隨行記（二）〉，《教化通信》，號 70（1944 年 5 月 15 日），頁 5；李振遠，〈教化報國講演班隨行記（三）〉，《教化通信》，號 71（1944 年 5 月 25 日），頁 4；李振遠，〈教化報國講演班隨行記（四）〉，《教化通信》，號 72（1944 年 6 月 5 日），頁 3。

134 小竹一郎，〈教化講演隨行感想〉，《教化通信》，號 72（1944 年 6 月 5 日），頁 3。

135 李振遠，〈道教礦山講演紀行（三）〉，《教化通信》，號 78（1944 年 8 月 5 日），頁 3。

六、結　論

如果說殖民地印度猶如大英帝國王冠中最美之寶石，那麼擁有領土近三倍大的滿洲國，無疑對日本也充滿著重要象徵。1930 年代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 1900-1989）觀察東亞情勢時，曾以「日本的歐洲」形容這個新興國度，[136]其中意義不言可喻。然而，日本決定發動侵略戰爭，無論從面積廣袤或人口數量來說，皆可謂爲「不可能的任務」，且舉動簡直匪夷所思。[137]嗣後隨著殖民事業開展，爲了進一步強化其合法性，日本對滿採取多元治理，在政治、軍事、經濟等方面到處可見指標性的政策；這不獨爲剝削性的活動而已，其中還包括了帝國各項制度、組織與人才的轉移。

值得注意是：日本對滿的殖民治理，係以知識爲前驅，並通過制訂政策加以落實。主要辦法乃藉由各項調查，包括地方社會與民情，轉化成爲日後施政的依據。而如此支配的原則，不單由學者統籌專責，還兼以培訓技術官僚來輔助，雙管齊下。與過去帝國直接派遣官僚參與殖民地的地方事務不同，[138]大同學院的成立爲滿洲國提供「間接統治」之人才來源，辦法頗似於英國在印度設立高等文官制度。[139]經由考試選拔、研修課程、實地調查等各項程序，滿洲國

136 Owen Lattimore, "Japan's Europe," *Pacific Affairs*, 7:2 (June 1934), pp. 198-200. 相關討論可見 Charles A. Fisher, "The Britain of the East? A Study in the Geography of Imitation," *Modern Asian Studies*, 2:4 (July 1968), pp. 343-376.

137 熟悉中國事務的《紐約記者》就認爲日本侵犯滿洲、發動軍事衝突，實爲不可思議，後果難以評估。Hallett Abend, *My Years in China, 1926-1941* (London: John Lane The Bodley Head, 1944), pp. 148-149.

138 松田利彥，〈帝国日本の政策連鎖──内務官僚の植民地への移入と「地方改良運動」〉，收入黃自進主編，《東亞世界中的日本與台灣》（臺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2013），頁 165-196。

139 大英帝國殖民印度的發展，最初由掌握印度海岸畸零地開始，之後改成農業爲主的統治模式。但是爲了因應現況，先以東印度公司來負責全權行政管理，亦即「公司治理」（company rule）模式，1858 年平定民亂後才改爲「直轄治理」（crown rule），直到 1947 年獨立爲止。其中最關鍵的是成立印度高等文官制（Indian Civil Service），協助殖民事業。W. Murray Hogben, "An Imperial Dilemma: The Reluctant Indianization of the Indian Political Service," *Modern Asian Studies*, 15:4 (October 1981), pp. 751-769; 浜渦哲雄，《英国紳士の植民地統治：インド高等文官への道》（東京：中央公論社，1991）。

和殖民當局派遣這些人員前往各地，逐步達成控制基層社會之目標。在過程裡，知識生產是將被支配民眾的「意義網絡」──如地方慣習、法令、生活型態等各項「象徵體系」[140]──進一步化成日常生活和政策，納爲殖民統治之正當基礎。

有別於其他產業調查，大同學院每次的實態考察，等同替殖民當局施行了一次對地方行政的「確認」。從院生撰寫的報告書中，可以體察滿洲國各地社會真實樣態，包括舊勢力延續、抗日武裝者的潛伏、自衛組織和保甲制之存在、稅收窮乏等現象。它們無疑地開啓這群準殖民官吏認識滿洲的第一步，有助於深化滿洲國訴諸「殖民近代」的治理風格。而每當情勢產生若干變化時，此類地方調查工作也隨之調整，考察對象和方法亦跟著不同。本文舉稱農村考察與村政實驗工作，即爲官方行政修正後嶄新的措施。換言之，這些都是在社會調查後所形成的一套管理「地方知識」辦法；又如大同學院從原先的視察報告，逐步修正到鄉村社會、農村實態及其建設，就是依據政策而變化的過程。設立模範村也促使了調查形式有所調整，[141]配合戰爭動員向基層滲透。

地方社會的調查經驗後來擴至滿洲國以外各地，甚至導入戰爭動員體制之中。[142]迄中日戰事爆發，殖民知識的生產再次歷經性質的轉變，改以「共同體」

140　有關知識的生產如何成爲「意義網絡」和「象徵體系」，筆者主要參考 Arthur M. Hocart, *Kings and Councillors: An Essay in the Comparative of Human Socie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0), p. 128.

141　譬如實驗縣旗的模範村開始陸續被選定後，大同學院的調查則朝向簡略化，廢止「戶別調查」的方法。滿洲帝國大同學院編，《大同學院要覽》（新京：編者印行，1940），頁 47。

142　以大同學院爲例，包括後來設立的研究所、特別講習的課程裡，強調「供諸實用、立即反映於國政」之功能。這方面的報刊記載到處充斥，見〈滿洲大同學院視察團來京．昨訪問新民會．定今日轉赴張家口參觀〉，《晨報》，1938 年 10 月 5 日，第 8 版；〈滿大同學院視察團．來京觀光．今日訪問行政會〉，《晨報》，1938 年 10 月 11 日，第 10 版；〈大同學院講習生赴國境視察〉，《大同報》，1940 年 3 月 11 日，第 2 版；〈滿大同學院參觀華北蒙疆．昨由京轉赴張垣〉，《東亞晨報》，1940 年 10 月 20 日，第 2 版；〈滿大同學院參觀團昨晚抵達北京．明日赴張垣廿四日返京視察〉，《河北日報》，1940 年 10 月 20 日，第 3 版；〈大同學院學生抵東安省視察〉，《大同報》，1940 年 10 月 22 日，第 10 版；〈大同學院學生間島視察日程〉，《大同報》，1941 年 3 月 3 日，第 5 版；〈期養成國家指導者．新設大同學院研究所〉，《三江報》，1943 年 3 月 23 日，第 1 版；〈滿視察班莅厚市〉，《蒙疆新報》，1944 年 3 月 2 日，第 2 版。

（community）爲概念描述東方社會，[143]並融合所謂「大東亞共榮圈」（Greater East Asia Co-Prosperity Sphere）的思考。日本擷取「共同體」理論裡的隻字片語，形容中國農民是未被西方資本主義思潮所腐蝕的群體，在他們身上可看到原始的亞細亞式「合作共榮」價值。而從西方列強手中搶救、保存這些價值，無疑正是日本的「義務」所在，惟有時日本才具備這樣能力，肩負起此一重任。[144]在動員民眾和普及「教化」工作，滿洲新國度便積極運用宗教和民間信仰，形成傳頌殖民治理的媒介。

儘管滿洲國以「重建農村」擴大殖民者的地方基礎，在日本敗戰後畫下休止符，但隨後展開的國共內戰，農村依舊爲中國社會改革的核心問題。因此在中國東北農村，民心向背也是兩黨一決勝負的關鍵所在。中國共產黨部隊沿著松花江以北、哈爾濱以東的偏鄉大肆施行土地改革和宣傳，趁勢吸納被國民政府裁員的滿洲國軍隊，結果形勢丕變，促使廣大農民轉而支持共方。據傳當時林彪（1907-1971）經常鑽研「整風文獻」的經驗，調查農村社會性質，企圖「發動群眾」。[145]至於滿洲國改造農村、樹立模範的「新村」夢想，直到冷戰期間還在東亞地區的日、韓兩國政治環境裡發酵，[146]成爲未解難題。當中延續性關係顯非本文主旨，有待日後的探索了。

---

143 關於「共同體」一詞，親身經歷過的學者旗田巍指稱這是源自魏復古（Karl Wittfogel, 1896-1988）「東方專制主義」構想，並在二戰期間爲日本學者所採用。旗田巍，《中国村落と共同体理論》（東京：岩波書店，1973），頁 10-15。

144 Prasenjit Duara, *Culture, Power, and the State: Rural North China, 1900-1942*, p. 209.

145 舒雲，《林彪傳》（紐約：明鏡出版社，2016），頁 455-456。

146 特別是大韓民國總統朴正熙（1917-1979），在 1971 年至 1980 年推動「新村運動」（Saemaul Udong），被認爲源自朝鮮總督府的「農村振興」運動，以及運用滿洲人脈與經驗。見姜尙中、玄武岩，《大日本・満州帝国の遺産》（東京：講談社，2016），頁 268-273； Seung-Mi Han, "The New Community Movement: Park Chung Hee and the Making of State Populism in Korea," *Pacific Affairs*, 77:1 (Spring 2004), pp. 69-93. 日本的情況可見田中淳，〈農村経済更生運動の再検討──戦後開拓史研究への序論として〉，《駒沢史学》，卷 53（1999 年 3 月），頁 171-189。

徵引書目

一、史料文獻

〈大同佛教會講演班赴地方〉，《教化通信》，號 50，1943 年 10 月 25 日，頁 5。
〈教化旬報．大同佛教會宣化班在城縣各村屯講演續誌〉，《教化通信》，號 39，1943 年 7 月 5 日，頁 7。
〈鄉村社會調查報告書編纂〉，《滿洲評論》，卷 8 號 16，1935 年 3 月，頁 20。
〈滿洲國地方自治制改善案〉，《滿洲評論》，卷 4 號 15，1933 年 3 月，頁 23。
〈瀋陽縣古城子村の敎化建設（上）──農村教化建設指定村の狀況〉，《大亜細亜》，卷 4 期 9，1936 年 9 月，頁 80-86。
〈瀋陽縣古城子村の敎化建設（下）──農村教化建設指定村の狀況〉，《大亜細亜》，卷 4 期 10，1936 年 10 月，頁 72-78。
《三江報》，1943 年 3 月。
《大同報》，1933 年 4 月至 1942 年 4 月。
《東亞晨報》，1940 年 10 月。
《河北日報》，1940 年 10 月。
《益世報》，1932 年 7 月。
《晨報》，1938 年 10 月。
《電影報》，1941 年 10 月。
《蒙疆新報》，1944 年 3 月。
大同学院史編纂委員会編，《大いなる哉．滿洲》，東京：大同学院同窓会，1966。
大同學院第一部第九期生農業經濟演習班編，《滿洲農村の實態──中部滿洲の一農村に就て》，新京：滿洲帝國大同學院，1938。
大同學院圖書部委員編，《滿洲國各縣視察報告》，東京：大同學院，1933。
大同學院圖書部編，《奉天省各縣視察報告》，大連：大同學院，1932。
小竹一郎，〈教化講演隨行感想〉，《教化通信》，號 72，1944 年 6 月 5 日，頁 3。
中田晃，《燈影荘物語》，京都：一燈園出版部，1972。
中西利八編，《第三版滿洲紳士錄》，東京：滿蒙資料協會，1940。
中西利八編，《新日本人物大系》，東京：東方經濟學會出版部，1936。
井上義人，〈滿洲國各縣農事指導員の重要性〉，《大亜細亜》，卷 3 期 4，1935 年 4 月，頁 38-42。
井上實，〈農本建設の起點．模範村の經營につき〉，《大亜細亜》，卷 3 期 3，1935 年 3 月，頁 2-9。
井上實，〈滿洲農村社會に於ける新興樣相と其發展〉，《大亜細亜》，卷 3 期 6，1935 年 6 月，頁 2-9。

今井信一郎，〈農村救濟に關する意見書〉，《大亜細亜》，卷 3 期 4，1935 年 4 月，頁 34-37。
內尾直昌編，《滿洲國名士錄 · 康德元年版》，東京：人事興信所，1934。
內堀維文，〈中國民族の長〉，《日華學報》，號 11，1930 年 1 月，頁 44-66。
外務省情報部編，《現代中華民國滿洲帝國人名鑑》，東京：財團法人東亞同文會，1937。
末光高義，《支那の秘密結社と慈善結社》，大連：滿洲評論社，1932。
田中鈞一，《実録 · 型破り明治男》，東京：泰流社，1980。
石田武夫，〈新鄉約運動の提唱〉，《大亜細亜》，卷 4 期 4，1936 年 4 月，頁 19-23。
石原莞爾，《國防政治論》，東京：聖紀書房，1943。
伊東岱吉，〈東亞共榮圈と滿洲經濟の建設〉，收入慶應義塾高等部學術研究會編，《大東亞の社會と經濟》（東京：北隆館，1943），頁 169-170。
佐藤愼一郎，《佐藤愼一郎選集》，東京：佐藤愼一郎選集刊行会，1994。
李振遠，〈教化報國講演班隨行記（一）〉，《教化通信》，號 69，1944 年 5 月 5 日，頁 5。
李振遠，〈教化報國講演班隨行記（二）〉，《教化通信》，號 70，1944 年 5 月 15 日，頁 5。
李振遠，〈教化報國講演班隨行記（三）〉，《教化通信》，號 71，1944 年 5 月 25 日，頁 4。
李振遠，〈教化報國講演班隨行記（四）〉，《教化通信》，號 72，1944 年 6 月 5 日，頁 3。
李振遠，〈道教礦山講演紀行（三）〉，《教化通信》，號 78，1944 年 8 月 5 日，頁 3。
李紫翔，〈中國農村運動之理論與實際〉，《新中華》，卷 3 期 18，1935 年 9 月，頁 5-14。
里見甫編，《滿洲國現勢（建國──大同二年版）》，新京：滿洲國通信社，1933。
周鯨文主編，《淪陷八年的東北》，香港：時代批評社，1939。
奉天省公署教育廳編，《農村教化建設指定村瀋陽縣古城子村教化建設狀況》，奉天：編者印行，1935。
岩崎久男，〈県行政と実験村〉，收入満洲回顧集刊行会編，《あゝ満洲》，東京：編者印行，1965，頁 142-144。
岩崎久男、山崎寿，《大陸の村つくり》，新京：奉天省興農合作社聯合會，1940。
延安時事問題研究會編，《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淪陷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
東亞問題研究會編，《滿洲國產業要覽》，東京：三省堂，1939。
武藤富男，《私と満州国》，東京：文藝春秋，1988。
法本義弘編，《內堀維文遺稿並傳》，東京：內堀維文遺稿並傳刊行會，1935。
者訓，〈日本對於東北農業的統制與農村的破產〉，《新亞細亞》，卷 11 期 5，1936 年 5 月，頁 72-78。
金平歐，《對日決鬥之認識與策動》，南京：拔提書店，1933。
原覺天、伊藤武雄、三輪武、浅田喬二等訪問，〈「滿洲」農村実態調査遺聞〉，收入井村哲郎編，《満鉄調查部──関係者の証言》，東京：アジア経済研究所，1996，頁 46-47。
孫陵，《從東北來》，桂林：前線出版社，1940。
國務院總務廳編，《滿洲國政府公報》，號 23，1932 年 7 月 11 日，頁 1。

喬啓明，《中國農村社會經濟學》，上海：上海書店，1992，影印商務印書館 1947 年版。
堤，〈濱江省の新鄉村制度案について〉，《滿洲評論》，卷 11 號 22，1936 年 6 月，頁 5-7。
實實，〈合作運動與鄉村改良運動〉，《吉林民眾教育講演月刊》，期 3，1930 年 10 月 31 日，頁 4-7。
滿洲帝國大同學院編，《大同學院要覽》，新京：編者印行，1940。
滿洲國大同學院圖書部委員編，《滿洲國鄉村社會實態調查抄》，東京：滿洲國大同學院，1935。
維眞，《九一八後東北與日本》，上海：貞社，1935。
蓋平縣和尙村公所，〈實驗村建設記錄（上）‧康德五年施設計劃書〉，《大亜細亜》，卷 6 期 8，1938 年 8 月，頁 24-31。
樊蔭南編，《當代中國名人錄》，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1。
權亢集，〈滿洲農村振興對策私案〉，《大亜細亜》，卷 4 期 12，1936 年 12 月，頁 21-32。
Abend, Hallett. *My Years in China, 1926-1941*. London: John Lane The Bodley Head, 1944.
Lattimore, Owen. “Japan’s Europe.” *Pacific Affairs*, 7:2 (June 1934), pp. 198-200.
Powell, John Benjamin. *Who’s Who in China: Biographies of Chinese Leaders*. Shanghai: The China Weekly Review, 1936.

二、專著

山室信一，《キメラ——滿洲国の肖像》，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06，增補版三版。
中村義等編，《近代日中関係史人名辞典》，東京：東京堂出版，2010。
広川佐保，《蒙地奉上：「満州国」の土地政策》，東京：汲古書院，2005。
朱允恭，《王鳳儀年譜與語錄》，臺北：萬國道德總會，1993。
克里‧史密斯（Kerry Smith）著，劉靜譯，《危機年代：日本、大蕭條與農村振興》，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8。
李林，《滿族宗譜研究》，瀋陽：遼瀋書社，1992。
直木孝次郎，《武者小路実篤とその世界》，東京：塙書房，2016。
姜尙中、玄武岩，《大日本‧満州帝国の遺産》，東京：講談社，2016。
胡昶、古泉，《滿映——國策電影面面觀》，北京：中華書局，1990。
孫江，《作爲他者的宗教：近代中國的政治與宗教》，臺北：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6。
徐炳三，《「扭曲」的十字架——僞滿洲國基督教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18。
浜口裕子，《日本統治と東アジア社会——植民地期朝鮮と滿洲の比較研究》，東京：勁草書房，1996。
浜渦哲雄，《英国紳士の植民地統治：インド高等文官への道》，東京：中央公論社，1991。
滿洲国史編纂刊行会編，《滿洲国史‧各論》，東京：滿蒙同胞援護会，1971。
舒雲，《林彪傳》，紐約：明鏡出版社，2016。
貴志俊彥、松重充浩、松村史紀編，《二〇世紀滿洲歷史事典》，東京：吉川弘文館，2012。

楊家余，《內外控制的交合——日偽統制下的東北教育研究（1931-1945）》，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5。

旗田巍，《中国村落と共同体理論》，東京：岩波書店，1973。

劉晶輝，《民族、性別與階層——偽滿時期的「王道政治」》，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

藤川宥二，《実録・満洲国県参事官——大アジア主義実践の使徒》，大阪：大湊書房，1981。

藤川壽桓，〈宗教與滿洲帝國（四）〉，《教化通信》，號 49，1943 年 10 月 15 日，頁 6。

Alitto, Guy S. *The Last Confucian: Liang Shu-ming and the Chinese Dilemma of Moderni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

Davis, Winston B. *Japanese Religion and Society: Paradigms of Structure and Change*.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2.

Duara, Prasenjit. *Culture, Power, and the State: Rural North China, 1900-1942*.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Duara, Prasenjit. *Sovereignty and Authenticity: Manchukuo and the East Asian Modern*.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3.

DuBois, Thomas David. *Empire and the Meaning of Religion in Northeast Asia: Manchuria 1900-194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Geertz, Cliffor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Harrison, Mark. *Public Health in British India: Anglo-Indian Preventive Medicine 1859-191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Huang, Philip C. C. *The Peasant Economy and Social Change in North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Hocart, Arthur M. *Kings and Councillors: An Essay in the Comparative of Human Socie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0.

O’Dwyer, Emer. *Significant Soil: Settler Colonialism and Japan’s Urban Empire in Manchuri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Wilson, Sandra. *The Manchurian Crisis and Japanese Society, 1931-33*.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Young, Louise. *Japan’s Total Empire: Manchuria and the Culture of Wartime Imperial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三、論文及專文

上沼八郎，〈内堀維文と山東省師範学堂〉，《国立教育研究所紀要》，卷 115，1988 年 3 月，頁 65-73。

中山義弘，〈五四運動期における「新しき村」の試み〉，《北九州大学外国語学部紀要》，通号 40，1979 年 11 月，頁 1-37。

王貴忠，〈關東軍自治指導部始末〉，《日本研究》，1993 年第 2 期，頁 63-66。

田中淳，〈農村経済更生運動の再検討——戦後開拓史研究への序論として〉，《駒沢史学》，卷 53，1999 年 3 月，頁 171-189。

池楨，〈「桃花源」、「美國夢」、「萬能藥」與「烏托邦」——20 世紀 30 年代中國的鄉村建設實驗〉，《史林》，2013 年第 5 期，頁 113-120。

東眞行，〈旧ソ連領被抑留者における「収容所の親鸞」——西元宗助と石原吉郎をめぐって〉，《現代と親鸞》，卷 42，2020 年 7 月，頁 2-28。

松田利彥，〈帝国日本の政策連鎖——内務官僚の植民地への移入と「地方改良運動」〉，收入黃自進主編，《東亞世界中的日本與台灣》，臺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2013，頁 165-196。

林志宏，〈地方分權與「自治」——滿洲國的建立及日本支配〉，收入黃自進、潘光哲主編，《近代中日關係史新論》，新北：稻鄉出版社，2017，頁 643-683。

林志宏，〈殖民知識的生產與再建構——「滿洲國」時期的古物調查工作〉，《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87，2015 年 3 月，頁 1-50。

長岡新吉，〈「満州国」臨時産業調査局の農村実態調査について〉，《経済学研究》，卷 40 号 4，1991 年 3 月，頁 1-25。

浅田喬二，〈「満州経済論争」をめぐる諸問題〉，《駒沢大学経済学論集》，卷 14 号 1，1982 年 6 月，頁 33-79。

桂島宣弘，〈宗教概念と国家神道論〈帝国＝植民地〉を射程に入れて〉，收入磯前順一、尹海東編，《植民地朝鮮と宗教——帝国史 · 国家神道 · 固有信仰》，東京：三元社，2013，頁 144-148。

新谷恭明，〈日本最初の修学旅行の記録について：平沢金之助「六州遊記」の紹介〉，《九州大学大学院教育学研究紀要》，号 4，2002 年 3 月，頁 37-61。

新保敦子，〈梁漱溟と郷村建設運動——山東省鄒平県における実践を中心として〉，《日本の教育史学：教育史学会紀要》，通号 28，1985 年 10 月，頁 92-109。

解學詩，〈偽滿洲國的政權體制和基層社會組織〉，收入楊天石、庄建平編，《戰時中國各地區》，北京：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頁 1-22。

藤田佳久，〈東亜同文書院生の大調査旅行と『支那省別全誌』および『新修支那省別全誌』との間——書院生が見た近代東アジア〉，《愛知大学東亜同文書院大学記念センター報》，卷 26，2018 年 3 月，頁 3-28。

Fisher, Charles A. “The Britain of the East? A Study in the Geography of Imitation.” *Modern Asian Studies*, 2:4 (July 1968), pp. 343-376.

Godart, G. Clinton. “Nichirenism, Utopianism, and Modernity: Rethinking Ishiwara Kanji’s East Asia League Movement.” *Japanese Journal of Religious Studies*, 42:2 (January 2015), pp. 235-274.

Han, Seung-Mi. “The New Community Movement: Park Chung Hee and the Making of State Populism in Korea.” *Pacific Affairs*, 77:1 (Spring 2004), pp. 69-93.

Hogben, W. Murray. “An Imperial Dilemma: The Reluctant Indianization of the Indian Political Service.” *Modern Asian Studies*, 15:4 (October 1981), pp. 751-769.

Li, Ji. “Catholic Communities and Local Governance in Northeast China.” *China Review*, 18:4 (November 2018), pp. 110-111.

Prakash, Gyan. “Subaltern Studies as Postcolonial Criticism.”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9:5 (December 1994), pp. 1475-1490.

Sand, Jordan. “Subaltern Imperialists: The New Historiography of the Japanese Empire.” *Past and Present*, vol. 225 (November 2014), pp. 273-288.

Wright, Tim. “The Manchurian Economy and the 1930s World Depression.” *Modern Asian Studies*, 41:5 (September 2007), pp. 1073-1112.

Rebuilding Legitimacy:
Local Surveys, Model Villages and "Civilizing" Processes in Manchukuo

Lin Chih-hung*

Abstract

Concerning how Manchukuo controlled local society and instituted the basis for its rule, the present article examines the processes by which the state established legitimacy and expounds the shifts in its governance policies from three dimensions. First, the "travel study" reports of Datong Academy (Daidō gakuin 大同学院) are used to analyze how the colonizers employed social surveys to deepen their understanding of county administration, materials which both represent the "knowledge production" accumulated during investigations into local areas and reveal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the regime concerning governance. For the colonizers, moreover, this investigation work resembled a reaffirmation of local administration, one which used statistics to enhance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Second, the author focuses on rural reconstruction policies. When carrying out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control policies, colonial authorities expanded their influence into the vast rural hinterland, exemplified by Datong Academy's investigations in 1934. Manchukuo then used rural reconstruction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ideal society as propaganda, while appealing for "modernity" as a governing ideal. Finally, this article takes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l villages and promotion of "civilizing lectures" to elucidate how Manchukuo realized legitimacy and Japanese colonial strategies. In 1934, Fengtian province implemented the "Experimental Village Plan" in Shenyang, Gaiping, Hailong, Lishu, and elsewhere, both meeting the needs of different industries and drawing in Japanese immigrants to strengthen colonial rule. In addition, the activities of religious associations, in the name of "serving the country," aligned themselves with war needs and mobilized the public. Such use of universal values to beautify aggression thereby constituted a "moral façade," characteristic of Japanese imperialism.

Keywords: **Manchukuo, Japanese imperialism, social surveys, model villages, civilizing**

*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